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一部宪制演变的简史

当武士道内化为道德律

伏尔加河畔的罗素

藏底片

何以解忧？惟有跑步！

波士顿人

让-雅克·阿诺

——其实我一直都在拍电影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执行编辑

苏小和 王晓渔 成庆 言一
夏佑至 扬克 孙骁骥 灵子

轮值编辑

刘柠

观察员

经济：苏小和（北京）
思想：成庆（上海）
文史：王晓渔（上海）

特约撰稿人

戴新伟（广州）	刘柠（北京）
夏佑至（上海）	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
凌越（广州）	孙骁骥（北京）
贾葭（香港）	罗四鸽（美国·波士顿）
孙传钊（上海）	扬克（德国·图宾根）
灵子（北京）	吴强（北京）
言一（成都）	朱白（广州）
朱航满（石家庄）	

设计 刘承周（北京）

2014年5月 第8卷第04期

总第75期

致力于 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细则

- 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 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连续三期撰写阅读报告将列入观察员名单，连续三期没有撰写视为自动退出；一年内在“独立阅读”发表三篇及以上文章者列入特约撰稿人名单，否则视为自动退出。
- 独立阅读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烦请发信至shrbooks@gmail.com。

更多即时信息：<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

以往各期“独立阅读”均可在以下地址下载：<http://www.chinairr.net/issu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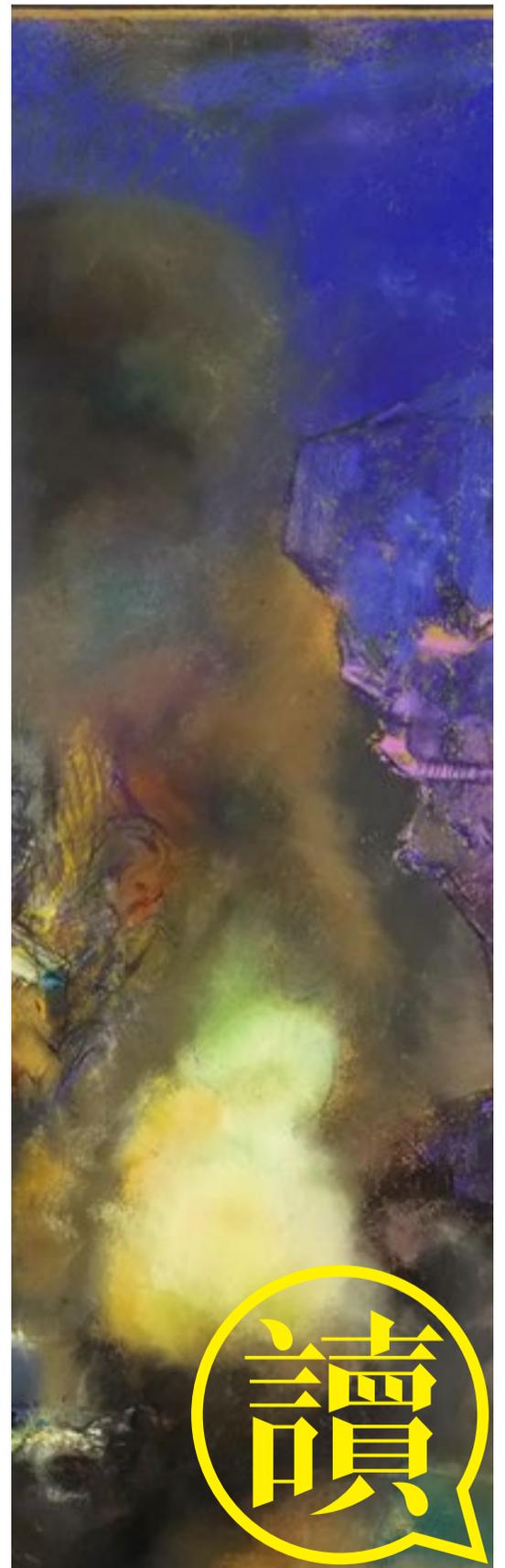
“独立阅读”的微博地址为：<http://weibo.com/1819737225>

欢迎各位关注。

当这一期《独立阅读》出炉的时候，人在日头底下，原本是初夏的短促的身影，竟越拉越长，转眼间就到了中秋……“拖拉机”，也该有个限度不是？雾霾的中秋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可是，故土，在哪里？惟其经历了从初夏到中秋，又去了趟上海，再回到北京，才有资格说：今年夏天，是南北对调。上海书展时，阴雨霏霏，人走在法国梧桐的街树下不仅一点觉不出热来，还相当治愈。可一回到帝都，污突突，雾蒙蒙，有如掉进了一个巨大的芬兰浴室。近年来，不知怎的，频繁遭遇这种“南北对调”，颇错愕：如冷不丁会在帝都的酒席上遭遇一位爷，不仅豪饮，且特会劝酒。一问，却是江苏籍人士；而过去盘踞在798、宋庄的艺术家们，原本是光头，甚至赤裸上半身，喝酒不用酒杯，直接“吹”的主儿，曾几何时，却流行起吃日料，用小瓷盅喝水一样淡的清酒。诸如此类，是“南水北调”工程带来的基因突变吗？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明显感到，人的阅读越来越依赖手机，几乎是推送什么读什么，少有人网上绕世界读网页了。这种阅读习惯的改写，是深刻的。现状之下，《独立阅读》作为一份网刊，虽创刊也未久，但已有了某种沧桑感。蒙读者诸君不弃，一路跟随我们，也使我们这群怀旧者多少也有了可资怀旧的理由。不过，我仍然相信，当一份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勾当不经意间被做起来的时候，惟一能坚持下去的动力，也许并不是所谓“意义”之类，而是“练下去”这件事本身的诱惑。

或者，即使我们不练了，那——世界会更好吗？



目录

封面用图

Ophelia
Odilon Redon



阅读报告 中国大陆

苏小和（经济）

王晓渔（文史）

005-014

书评

○ 王晓渔
一部宪制演变的简史

○ 刘柠
当武士道内化为道德律

○ 罗四鸽
伏尔加河畔的罗素

015-024

随笔

○ 夏佑至
藏底片

○ 吴强
何以解忧？惟有跑步！

○ 罗四鸽
波士顿人

025-034

访谈

○ 灵子
让-雅克·阿诺
——其实我一直都在拍电影

035-0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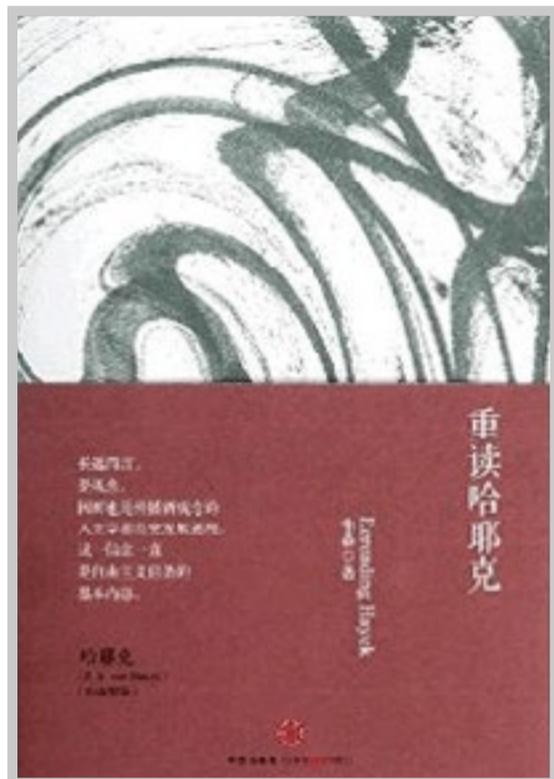
苏小和

本次阅读报告经济部分，我重点谈谈对两本书的阅读感受，一本是韦森教授的《重读哈耶克》，一本是钱穆先生的《中国经济史》。

1.《重读哈耶克》

韦森教授出版了《重读哈耶克》（中信出版社，2014.7），或许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国内经济学界比较重要的学术事件。理由在于，关于哈耶克，中国大陆自由主义一脉的书生们谈论已经很久，但大多数都是一种围观的心态，尚无清晰的中国问题意识。这正是韦森的落脚之处：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哈耶克的一些著作被译介到中国大陆来之后，由于许多译者和论者太过于片面强调乃至过度诠释了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以及在六十至七十年代他的其他几本著作中所提出的“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概念及理论，而没有从整体上意识到他的自发社会秩序思想，实际上是哈耶克本人数十年持之以恒地论述在整体上设计一个计划经济体制非可行性（infeasibility）的理论延伸，从而把哈耶克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在人类社会演化发展中的“无为主义者”甚至“无政府主义者”。这种对哈耶克思想的简单和片面的理解，实



际上把他论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对自由、法治、宪政、民主、权利以及现代良序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乃至对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和道德基础的一些重要的或言根本性的论述和观点给忽视、遮蔽乃至搁置一边了”。

韦森坦言，所谓重读哈耶克，乃是他完成了—系列与哈耶克有关的背景式阅读与思考之后展开的学术功课。

“在最近几年，随着年岁的增长和对一些经济社会问题思考的深入，尤其是自2004年以来对欧洲市场史、法制史、政制史以及中国市场史、法制史、晚清宪政史乃至

世界科技史和货币史的大范围的阅读、思考和比较研究，笔者越来越觉得有必要对哈耶克博大精深的经济与社会思想全面的重读，也有必要对自己以及学界朋友和同仁（包括刚过世的著名学者邓正来教授）过去对哈耶克思想的解读和诠释进行新的反思”。

按照韦森自己的陈述，《重读哈耶克》这本书在试图整体还原哈耶克，在“哈耶克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往前走了一大步。

比如，韦森提醒人们，哈耶克首先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其次才是一个社会思想家或者说社会哲学家。然而，迄今为止，翻译到中国大陆来的，大都是哈耶克中期到晚期的政治学、法学和社会理论方面的著作。除了哈耶克1948年出版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和《货币的非国家化》（1976）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有一两个中译本外，195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曾出版过滕维藻和朱宗风两位先生合译的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但这本小册子在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一直没有再重印，因而也只是存放在少数大学图书馆中的书架上很少有人问津。因此，从整体上来看，国内经济学界真正了解哈耶克主要经济学思想的人并不多。

还比如，韦森在读完《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历史观念新研究》一书后引用了哈耶克的名言：“那种认为人作为一种存在可凭藉其理性而超越他所在的文明的价值观并从外面或一个更高的视角来对其作出判断的空想，只能是一种幻觉。我们必须知道，理

性自身也是文明的一部分。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拿一个部分去应对其他部分。就是这个过程也会引发持续不断的互动，以至于在很长时间内可能会改变整体。但是在这一过程的任何一个阶段，突发式或完全重新建构整体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总是要应用我们现有的材料，而这些材料本身就是一种演化过程的整体的产物。”

韦森引用这些话的意图是明显的，他的观点在这里如此清晰：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来说，进一步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建立一个现代民主与法治国家，当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然而，任何社会制度一旦演化生成，在一定的存在阶段上都有其自我维系的变迁张力。这实际上将会导致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理性社会中，任何国家也不可能完全地打碎一个旧体制，理性地设计并构建一个全新的体制。具体到中国当下格局和未来发展趋势来说，历史的命运也许是，我们必须在既存的体制安排中通过渐进性的改革，来逐渐催生出一个新体制。

这大概是韦森这样的自由主义精英为当代中国所构想的一个顶层设计与渐进改革的改良主义蓝图。韦森的学术面相，显然是工具理性的，即在哈耶克是什么的维度上奉行一种思想层面的拿来主义，而没有进一步深层次思考“哈耶克为什么是这样”的命题。如果这样的分析成立，那么我就有理由得出另外一个印象，今天中国大陆的自由主

义精英们值得肯定的进步，是从过去苏联和法国的激进理想主义思想史的趣味中抽身而出，全面走向了英美的自由主义传统。但如何发现并理解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的内在逻辑，中国的自由主义精英们并未展开。

我在阅读哈耶克的时候，最大的震撼乃是哈耶克晚年对自己的一个总体性评价。在《自由宪章》的后记中，哈耶克专门加入了一篇重要的演讲稿《为什么我不是保守主义者》，他说他找不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词语来描述他的观点或者他所代表的传统，所以他认为把自己定义为“老辉格党人”最为贴切，而在《哈耶克谈哈耶克》之中，哈耶克的确这么表述过，“我正在变成一位柏克式的辉格党人”。

刘军宁曾经谈到这一点，他说，哈耶克成功完成了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与古典自由主义的衔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耶克才把自己评析为一名老辉格党人。但哈耶克并没有打通古典自由主义与辉格党人的信仰谱系，也就是说，他也只是在辉格党人的工具理性的层面全面沿用了辉格党人的方法论，但没有在辉格党人的价值理性的层面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古典自由主义成为人类的一种可能性。

刘军宁老师的问题意识可谓深刻。事实上大陆自由主义精英们在如何理解哈耶克的命题上，恐怕只有刘军宁走到了这一步。而韦森的这本《重读哈耶克》依然只是关于哈耶克思想的一次中国式梳理，而不是对

哈耶克思想的深层次的追问。这样的学术状态，多多少少有点类似于老派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或者是“中西体用”辨析，即人们更愿意停留在工具理性的层面，通过对哈耶克的思想的理解和运用，找到中国问题的答案，而不是继续追问哈耶克思想的内在机理。即我们一直在努力理解哈耶克是什么，但我们似乎很少去追问，哈耶克为什么这么思考。伟大的哈耶克，在韦森这样的中国自由主义精英们的解读中，或许依然处在一个器物主义的层面，他们把哈耶克当成了改良中国的一件思想的工具，却没有看到哈耶克苦苦思考苦苦上升的人类思想者的姿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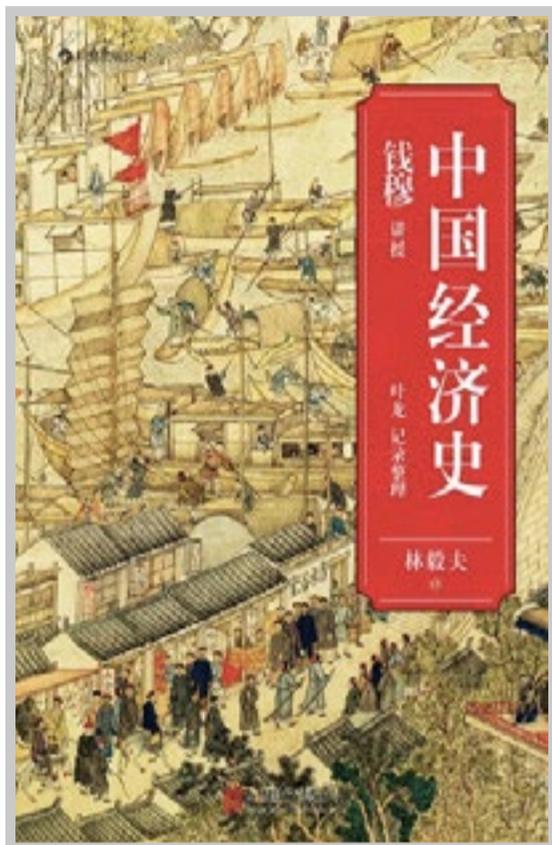
2. 《中国经济史》

关于钱穆先生的《中国经济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1月），按照我的阅读趣味，我必须直接说出我的感受。钱穆先生的中国经济史，多少有点让我失望。老人家为了守住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不惜上来就设定中西不兼容的思维方式，不顾经济分析的普遍性，也没有言明分析框架。比如钱先生批评西方人过多地沿用了唯物史观，认为西方学术界的经济史观大抵来自他们的唯物史观，这大概是不完备的界定。从斯密对经济史的分析框架，到米塞斯沿用人的行为范式来统合经济史，再到弗里德曼的通过货币的专业特征来分析经济史，这些经济史的大部头著作，通常都是从人的意义出发，只

有马克思的《资本论》遵守了唯物史观的分析路径，而马克思的经济学思考，在整个西方经济史和经济学思想史方面，不过是一个很小的分支而已。是不是钱穆先生不太了解这些经济史和经济学思想史的细节，才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不得而知。不过按照钱先生的趣味，他坚定地认为，“今日世界人类已觉醒，各国各民族各有一套自己民族的文化，并不佩服他人的”。仔细分析这句话，再去通读先生的《中国经济史》，想来这本重要的著作，从一开始就把思考的疆域限定在中国经济这个自闭的系统里。

比如谈到唐朝的租佃调制，钱先生历数了这种土地制度的优势，并认为唐朝经济辉煌几百年，主要与这种土地制度的界定有关。唐代政治家陆贽说：“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钱先生看好这样的观点，认为唐朝的土地制度有田有身有家，因而租佃调制是一种为民制产的制度，并将国家赋税放在公平的政策上，使得“民众安居乐业，政府财政亦可稳定”，而且，钱先生进一步分析，认为这种制度“不以田为主，而以人为主，可算是自由经济”。

抓住钱先生的这一与土地制度有关的经济史分析，或许可以提出一些问题。如果从斯密以来的经济学思想史的分析框架来看，唐朝租佃调制是一种由政府官僚体制界定的短期的土地制度，这带来两个方向的问题，第一，短期的租佃调制，背离了孟子所言说的恒产恒心的一般原则，第二，人与土地的



关系，不是一种先验的权利关系，而是由政府设计的交换关系，政府成为土地制度的主导者，官僚在制度设计上具有不受制约的权力。仔细审视唐朝的土地制度，发现与今天中国流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类似，大概属于一种过渡性质的，不完全市场经济的临时性策略，是对中央集权经济制度的一种强化。

还比如钱先生谈到了中国经济史上著名的“漕运”现象，以及与此有关的南粮北运问题。如果按照科斯企业的性质或者社会成本的分析方法，一些问题就应该提出。为什么中国朝廷一直都大兴漕运，谁在支持并操作漕运？钱先生陈述了相关的数据，是朝廷以及与朝廷官僚有关的商人在操作漕运，是朝廷将南粮北运问题提高到了朝廷的重

要政治事务，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市场交换事务。这些问题的提出逼着后人们思考，中国的漕运现象，可能是最不考虑社会成本的经济现象，而几千年以来的统制文化和统制经济，又为这种不计成本的经济方式提供了政治理由。

当然，问题推进到这一步，一个事关经济史的方法论问题，就必须讨论。钱穆先生倡导的方法，是用“温情恭敬”的态度，用“科学的归纳法”，去呈现经济史的真实一面，尽量不加入后来的分析与判断。这当然是很多中国历史学家一直以来坚守的方法论，尊重史料，不带入情绪，更不带入后学的分析框架，力图以客观和真实再现历史，也就是说，讲出历史本身，就是历史学最大的方法论。

所以，阅读钱穆的《中国经济史》，就必须直面更加重要的方法论命题，到底钱穆先生倡导的方法，是不是就是分析中国经济史应该有的方法？我们需要提出很多可以商榷的观点。

第一需要观察的学者，是钱穆先生的学生，余英时先生，一直以来似乎走出了在中国历史的范围之内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他呈现出一种比较的、开阔的、分析的历史观。尤其是他在研究中国历史的同时，接续了普遍的人权价值观，因而扩展了中国传统思想的疆域，让人们看到中国历史和历史学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位置。这是不是可以证明，如果不用比较的方法分析传统，只是在

一个自闭的体系里呈现和分析历史，很有可能走向通常意义上的画地为牢，甚至走向文化层面的民族主义。

同为台湾的经济史大家，侯家驹的《中国经济史》完全立足于他基于现代经济学的常识建构起来的分析模型，即政治意义上的集权统合与多元竞争，构成了经济史意义上的市场垄断与自由交换。侯家驹先生的经济史分析带有明显的前置性的分析框架，而不是钱穆先生使用的“科学的归纳法”这样笼统的方法论。杨小凯教授在写作“百年中国经济史”时，或许是意识到了分析框架的重要性，或许是他深厚的经济学训练让他意识到了人对历史观察的有限性，他上来就提出，一本历史著作都有显含或隐含的理论框架。这些框架对历史上各现象或变数之间的关系结构作一些假定，而记载历史不可能不采用一个组织史料的框架。实证的研究态度是在写史前，言明分析框架的假设，则读者可以自行判断这些假设与史实之间的关系。当这些分析框架足够多，且在不同框架之间有充分竞争时，对理解历史最有帮助的框架才会在学界共识的基础上脱颖而出。如果不言明潜在的对分析框架的假设，使读者误以为存在一个没有理论框架的纯客观历史，则读者反而会轻易相信一些很没有竞争力的分析框架，失去对分析框架的识别和批判能力。

按照这样的经济史方法论，有两种历史学的文本是值得警惕的，一种是以客观、科学为名，试图还原历史的历史学，事实上历

史已经过去，所有试图还原历史的历史学努力，都是人的理性的自负。另外一种则是事先不言明历史的分析框架，试图以一种绝对主义的历史视角，否定其它历史分析方法的历史学文本，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比如我们每个人都背诵过的历史教科书。

第二，仅仅就经济史而言，鉴于经济学理论是晚近的科学，因此经济史的呈现和分析，是不是必须要借助经济学的方法论？众所周知，古典经济学关于自由经济体系的提出，是指工业革命诞生的新技术引起的新的市场分工体系。新技术的出现，才是经济史最大的变量。按照斯密的分析，新技术兴起之前的经济态势，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之前则是重农主义。最近读钱穆的中国经济史，他显然不了解这个分析框架，按照斯密的分析，中国经济史一直到晚清1820年的被动开放时期，都是一般意义上的重农主义经济时代。正是在重农主义经济学的意义上，中国经济史面对工业革命和国际贸易秩序，掉进了一种中国经济和欧美经济简单的对抗里。这是一种经济史分析的遗憾。经济分析具有普适性，即人性在经济事务层面的行为是一致的。中国经济长期处在重农主义阶段，如果不是晚清所谓千年未有之变局，重商主义和自由经济的构建则无法展开。窃以为，以钱穆先生身处的时代，他的问题意识，应该是追问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出斯密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而按照斯密的分析框架，又必须追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兴起

近现代科学技术。这是李约瑟中国问题，即使是钱穆先生，也是无法回避的。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钱穆先生不关注经济史变迁过程中的新技术变量？晚清经济史出现新的秩序，尤其是晚清市场的被动开放，是从新技术开始的，即著名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是一个重大的经济史事实。没有技术的引进和学习，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不能开始。在已经形成的经济史分析思想中，我们看到，如果不关注新技术的变量，很可能就会掉进毛泽东事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之中。1945年，毛大谈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早在明朝中叶已经出现，如果不是受到西方列强的干扰，至20世纪初期中国一定会变成成熟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体系。台湾大历史学家刘广京、钱穆的学生余英时，都写出扎实的文章反驳毛的定论。这意味着新技术变量对经济史的巨大影响力，即使是当下的社会，中国有限度溶入国际市场，一些普遍的价值观成为一种可能性，也是互联网的技术要素引起的。而不是朝廷的恩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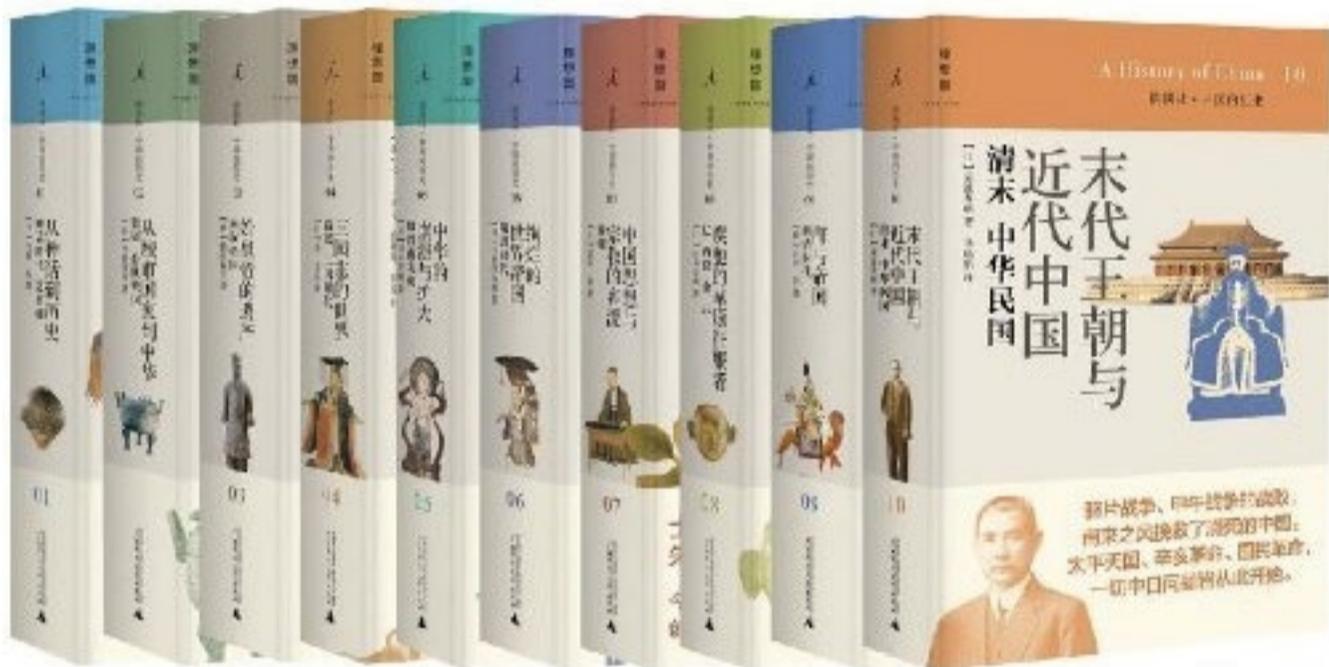
我们看到，陈志武教授组织的经济史研究，就是从关注新技术的变量开始，英国工业革命成为人类经济史的一个转型时代，在此之前，人类社会的财富历史一直都是稀缺的，贫乏的，人均财富占有率是非常低微的，而工业革命之后，人类财富高速增长，遂有今天丰富的现代生活。按照这样的分析，或许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钱穆先生提出了什么观点，而在于钱穆在当时当地，到底在信息和

知识结构的层面，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分布状态。这是阿玛蒂亚森的经济史分析逻辑，看待一个人的思想谱系，应该去观察和分析他的信息来源和信息构成。我想说出的观点是，或许钱穆先生在讲述中国经济史的时候，并没有在经济学方面过多涉猎，他是在用一种传统中国经史子集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中国的经济史。在方法论上，钱穆先生是传统的，他缺少一些经济史的专业性和现代性。

当然，钱穆先生乃一代鸿儒，思想磅礴，学术深厚，我等小子实在是没有任何资格对钱先生的文本挑三拣四。只是涉及到非常专业的经济史，沿着经济学的一般分析方法，斗胆说出一些冒昧的言辞。事实上钱穆先生也说过了，“历史可分为通史、断代史、专门史。经济史属专门史，如欲学习中国经济史，最好先能了解经济与历史之知识”。正是遵循先生这样的教导，我大言不惭地说出了上书粗浅的言辞，借此就教于各路大方之家。Q



王晓渔



精装的“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后，我一直期待着出版社能够推出简装本。因为家中书满为患，而且我有躺着读书的习惯，在精装和简装之间，我总是选择简装。可是简装没有等到，却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为了避免夜长梦多，立即把这套十本的丛书买回来。

这是讲谈社邀请日本学者撰写的一套专业和通俗兼备的中国历史读物，原书共有十二卷，可惜“当代中国卷”和“中日关系史”未能译成中文。更可惜的是，原书没有“五代十国卷”，这是中国史研究中最被忽略的一段。五代十国常被视为“分裂的乱世”，但国与国之间并不是一致的，仅就我所看到的资料来说，南唐、吴越、前蜀、后蜀并

不比大一统时期的盛世更差。分治是否等于分裂，是否等于乱世，这是需要讨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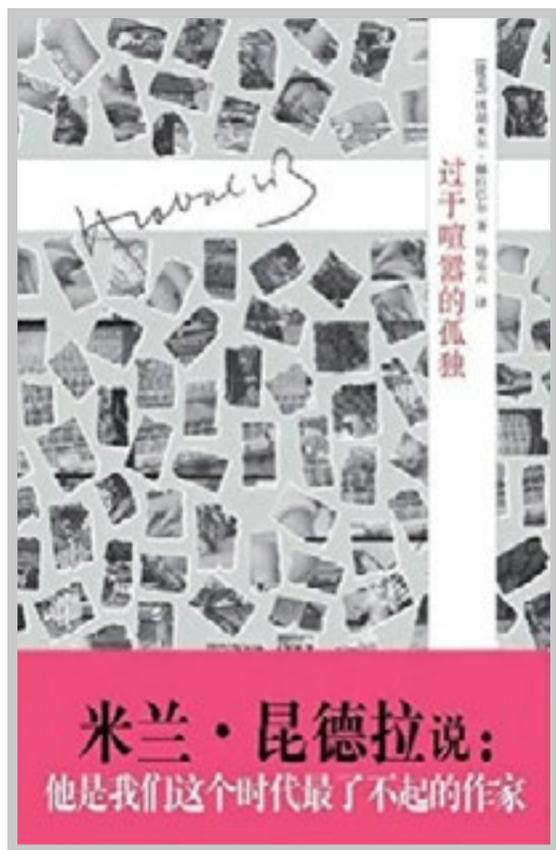
在中国通史写作中，苏秉琦先生批评的“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中心”召之即来、挥之不去，即使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也不例外。强调“大一统”，却同时强调“华夷之辨”，无异于抱薪止沸，成为很多民族问题的火药引线。这套“讲谈社·中国的历史”试图展现那些标准叙事以外的历史图景，可能会有争议，但也提供了更多观看历史的维度。这两年著作陆续被译成中文的杉山正明先生，在《疾驰的草原征服者》里把唐代称为“瞬间大帝国”，今人熟知的唐代疆域只维持了大约三十年（630年至660年）的时间，“几乎是转瞬即逝”。作者引用钱大

昕的著作批评“全盘‘圣化’北宋”，指出北宋制度上虽然不存在凌迟，但是真宗以后很普遍，“在一般被赞誉为文化国家的北宋的‘全盛期’，一直在实施着这种极刑”。

第十卷《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读来过于熟悉，作者菊池秀明先生专攻太平天国，或许对清末民初其他时间段的历史并无太多深入了解。此前阅读傅乐成先生主编的七卷本《中国通史》（九州出版社，2009年），也是读到近代史部分发现似曾相识，两岸除了互相评价不太一致，在其他历史问题上观点相近，可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阅读东欧/中欧的书籍，中国读者无需切换语境即可悠然心会。“蓝色东欧”译丛（花城出版社，2012年至今）第一辑收入了阿尔巴尼亚作家卡达莱等的作品，新近第二辑收入了捷克作家克里玛、波兰作家赫贝特等的作品，第三辑收入了波兰作家米沃什等的作品。第二、三辑目前可以看到的有克里玛《一日情人》、米克罗什《父辈书》、莱姆《索拉里斯星》、布拉加《神殿的基石》、萨拉蒙《十亿个流浪汉，或者虚无》。文学与政治这对冤家，在东欧/中欧作家那里，常得到恰当的安置，安置的方式就是维持两者的冤家关系。冤家意味着摩擦力，让文学与政治分家或者让文学臣服于政治，两种做法似乎是对立的，共同点是取消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摩擦力。

克里玛、昆德拉以小说见长，哈维尔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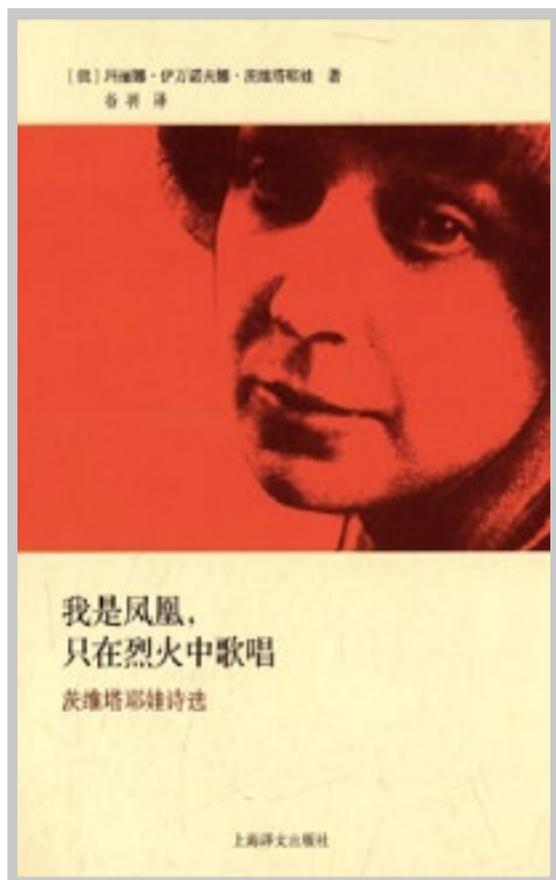


初以荒诞戏剧闻名，但我偏爱他们的随笔。赫拉巴尔是我最喜欢的捷克小说家，尤其是《过于喧嚣的孤独》和《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不知何故，赫拉巴尔总是波澜不惊。他的《河畔小城》（万世荣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如今被拆成《一缕秀发》、《甜甜的忧伤》、《时光静止的小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2月），这些标题不知能否吸引一些“小清新”们。

诗集出版一向困难，最近却让人有应接不暇之感。已经暂停大约两年的丛刊《当代国际诗坛》（作家出版社，2014年6月）恢复出版，推出了第七辑。“新陆诗丛·外国卷”继续推出《外国诗选65家》（李文俊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2月）、《黑塞诗选》

(林克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年2月), 此前出版的部分诗集也陆续推出简装本。奥登对诸多现代中国诗人影响深远, 可是他的作品难以寻觅, 《奥登诗选: 1927-1947》(马鸣谦、蔡海燕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年5月) 和待出的《奥登诗选: 1948-1973》、随笔评论集《染匠之子》和《前序与后跋》将构成较为完备的奥登读本。

1926年春夜, 帕斯捷尔纳克致信茨维塔耶娃: “我忍不住要给你写信, 却又想出去看一看, 当一个诗人刚刚呼唤过另一个诗人时, 空气和天空会出现什么变化。”(《三诗人书简》, 刘文飞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年)。如今, 《我是凤凰, 只在烈火中歌唱: 茨维塔耶娃诗选》(谷羽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年4月) 和三卷本的《帕斯捷尔纳克诗全集》(顾蕴璞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年4月) 同时出版, 这是他们在互相呼唤吗? **Q**



一部宪制演变的简史



王晓渔

中国近代史有两种主流叙事，一种是悲情叙事，一种是党化叙事。这两种叙事的共同点是“不自省”的历史观，所有的问题和错误都归咎于“他者”，自身是完全正确的。在这种历史观里，历史已经不再是历史，成为论述自身合法性的工具。史实不再重要，或者说史实是被选择过的，“他者”的错误和自身的正确同时被放大。

蒋廷黻先生写于1938年的《中国近代史》是奠定近代史叙事的“范式”之作，讲到鸦片战争时他跳出了悲情叙事的框架，没有神话林则徐，也没有把琦善视为内奸、没有把英国视为敌对势力，而是冷静而沉痛地表示，林则徐被罢免是“他的终身大幸事，而中国国运的大不幸”，因为“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是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

即使这本经典的《中国近代史》，也没有摆脱党化叙事的框架（甚至可以说，

它参与建立了近代史的党化叙事），第四章从戊戌到“北伐”的解读，基本是以国民党为视角展开的“革命史”，孙中山是先知先觉者，同盟会及国民党是革命史的主体，清朝政府和北洋政府成为负面典型。

这种党化叙事为红蓝两派共享，不限于大陆此岸，也不限于1949年之后，这也是它至今不衰的原因。很多大陆读者接受国民党的历史叙事，试图以此为跳板，跳出红朝的历史叙事，但最终依然落在党化叙事的框架和逻辑里。在党化叙事之下，出现“宪政史即党化史”的怪诞现象，即使宪政史也仅仅是以宪政为研究对象，视角却是党化的，以一党利益评判宪政得失。

刘仲敬先生的《民国纪事本末》开宗明义，要写“一种最古老、最重要的历史——宪制演变的历史”。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宪制演变的历史”又是最匮乏、最新鲜的历史。历史学者未必了解宪政常识，宪政学者又对近代史比较隔膜。在当

代学人的著述中，陈峰的《中国宪政史研究纲要》（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是为数不多的能够跳出党化叙事的一本，可惜影响有限。

《民国纪事本末》兼采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体例，对各种事关宪制演变的事件进行点评。

今人谈到《临时约法》，往往只关注谁遵守《临时约法》，谁违反《临时约法》，但对《临时约法》自身的程序和法理问题很少涉及——这很容易把责任单纯归咎于政治人物的“素质”。刘仲敬指出《临时约法》未能得到遵守，与自身问题有关。在制定程序上，已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孙中山公布《临时约法》，本身就需要存疑，“于情于理，当由参议院或业已就职之全国元首颁行约法”。在约法法理上，“民元法统兑现激进共和主义和超级国会制之彻底，独步全球，后无来者”。

对超级国会制，已有不少批评。此前帝制是君主专制，民初对于共和的理解是放大国会的力量（其中有孙中山失去临时大总统，试图以国会限制袁世凯的因素），但三权分立不应是某种权力独大。当超级国会制变成了国会专制，总统在这个限度内几乎无可作为，只能毁坏宪法。

激进共和主义，此前少有论述。甚至对民初共和的批评，多是指责选举范围太过有限，没有影响到中下层。刘仲敬做了比较，指出当时普选程度已经超出了同时期绝大多数欧美国家。后来的党人批评辛亥革命不够彻底，但是从20年代的大革命到60年代的大革命，“大革命”付出了无数



《民国纪事本末》
刘仲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28元

代价。民初共和出现种种危机，根源常在革命思维越过宪政思维，党人开出的药方却是“不断革命论”，可谓饮鸩止渴。

刘仲敬对“大一统”常有批评，戏称“华人之恶专制而恋大一统者，实无异于爱苗条而不舍甜食”。但是他对联省自治亦有批评，不是把联省自治指控为“分裂”，而是批评“民初省内集权制与民国联省制极不协调，违背联邦以县乡自治为节制州权根本之义”。这种批评或许可以商榷，但开拓了“联省自治”的讨论空间。如果每次讨论联省自治总是徘徊于“是不是分裂”的低位，那是很让人沮丧的。

宪制维度，使得道德叙事变得无效。孙中山和袁世凯常被视为正负两极，《民国纪事本末》却指出两者在观念上有共通

之处，孙中山在“联俄”之前即是国家社会主义倾向，袁世凯“亦国家主导经济论兼土改爱好者”。作者对陈炯明的评判也是如此，承认陈炯明是“罕见之道德型政客”，在陈炯明和孙中山之争中，并不站在孙中山之边，但是他批评陈炯明诛杀黄小佩之暴力，与宪政背道而驰。

民族主义也在书中消散了魔力，刘仲敬多次痛惜民族主义对自身国家利益的伤害。在民族主义至上的情况下，革命外交取代了公法外交，摧枯拉朽式的废除条约、收回租界容易收获民心，也轻易地扔掉了国家公信力，最终埋藏了很多后续的问题。

经过“去道德化”、“去自我中心主义”的自我清理，《民国纪事本末》具有“自省的视野”，同时也注重“内在的批评”。刘仲敬讲到“多数民国借款，皆以赖债了事”之时，谈及“华史绝不提及己方失德之处”。这是近代史最为致命之处，也是《民国纪事本末》难得之处。

刘仲敬对日俄美三个对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均有描述，他称日俄的区别是“俄狡倭暴”，“日式外交，擅长受横暴之名实，享微薄之实惠，恰与俄人相反”。这种说法初闻之下，有些难以接受，但是对照历史，却入木三分。1917年，苏俄宣布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这仅是一纸空文，非但没有兑现，苏俄还对中国加强渗透，可是那纸空文至今仍被中国传颂。1919年，五四之后，日本外相同意青岛归华，“以华方诚实执行一切协定为前提”。相比之下，美方对中国多有平等对待。1927年，党军进入

南京，伤及外侨，英美军队与之交火，刘仲敬指出“其曲在华，责无可卸”，事后美方中止宁案交涉，以示友华。在中国近代史中，俄国对中国的伤害和在中国享有的美名恰成正比，美方对中国多有平等对待却享有恶名，与俄国之待遇形成两个极端。

1928年，日本最为亲华之新党总裁床次竹二郎访华，反日会进行围攻，同时捣毁外长王正廷私宅。刘仲敬这样点评：

“五四以来，华民族主义所仇者，一向为友华势力，于仇华者无伎可施。‘爱国者’不受成法约束，‘卖国贼’公权不受保护，传统悠久深厚，除暴民乱政霸君专政外，不知有他。”

通过宪制的视野，刘仲敬对民国史有很多纵深的观察，诸如五四运动和三一八事件都呈现出更为多样的面貌。作者钩沉到许多不应被忽略的细节，比如注意到奉天财政厅厅长王永江、穆儒丐小说《福昭创业记》。王永江虽有两本研究专著（薛龙《张作霖和王永江》和王凤杰《王永江与奉天省早期现代化研究》）涉及，但即使在历史学界，只知张作霖不知王永江者也不罕见。《福昭创业记》1986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之后，没有再版，这两年台湾陆续出版了他的小说《梅兰芳》和《北京》，反响甚微。重提这些细节，有助于校正观看历史的视角。

宁汉隐为敌国，如何贯穿民国？革命吞噬立宪，怎么成为“主旋律”？军人零星干政与党人毁宪霸政有何区别？以国民大会为外交手段，对立宪程序和国会政治有何影响？五色旗遗老以什么方式报复党军

北伐?《民国纪事本末》的“洞见”俯拾皆是,这些“洞见”或许会有争议,但争议可以唤起对历史的多重思考。

抛开可能的争议不说,《民国纪事本末》亦有几处瑕疵。其一,大事记与郭廷以先生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多有重合,虽然参考文献列有此书,似以更加明确标示为宜;其二,对中央宪制较为关注,但对地方宪制关注较少,比如湖南省宪被一笔略过;其三,对北洋宪制论述较多,对南京政府宪制论述较少,这固然与后期宪制变动不是那么剧烈有关,但党国与宪制的关系值得申说;其四,重宪制实践,轻宪制思想,比如对“民主与独裁”之争几无涉及。

不过,如果把上述这些内容全部纳入,就不是一本书的容量了。在很多问题上,《民国纪事本末》只是点到为止,不乏粗疏之处。刘仲敬是休谟六卷本《英国史》的译者,如果能以宪制的维度撰写一部宪制中国史(不仅是中国宪制史),会很让人期待,这不仅关乎过去,更关乎未来。Q

当武士道内化为道德律



刘柠

不消说，武士道早于《武士道》，而且还不是早了一点半点，是早了五六百年。

《广辞苑》对“武士道”的释义是：“吾国武士阶层的道德律。镰仓时代开始发达，江户时代因儒教思想的进入而使之集大成并理论化，构成了封建统治体制的观念支柱，专注于忠诚、牺牲、信义、廉耻、礼仪、洁白、质素、俭约、尚武、名誉和情爱等价值。”

而《武士道》一书，成书于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间，于1899（明治三十二）年在美国出版。单从出版年代看便知，明治末年，正值日本战胜清国之初，士气大振，与俄国积怨日深。说白了，就是在与列强抗争的同时，拼命成为列强一员的时期，也是“崛起”中的东洋社会被西方当成“黄祸”而大加妖魔化的时期。作者新渡户稻造（Inazo Nitobe），是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早年赴美、德留学，获博士学位。作为第一代“开眼看世界”的日本人

之一，曾出任大学校长和国际联盟副理事长，其肖像至今印在5000日元的纸钞上。

以经过作者的美国夫人捉刀的、通俗晓畅的英文写成的《武士道》，是以西方社会为对象的对东洋文明的扫盲课，是一曲关于日本文化的抒情而激越的赞美歌。由于新渡户本人幼年时曾接受过武士道的传统教育，因此，在对西洋人介绍时，与众多外国的日本研究者至多充当一个“辩护律师”不同的是，“可以采取被告人的态度”，颇能进入角色，入木三分。其对东洋文化深层推销，令人想到后来林语堂对中华文化的推介。

书甫一出版，即在西方社会引起了极大反响，短时间内被翻译成数种文字风靡各国。仅日文版从1900年到1905年的六年间就再版了十次。据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不仅曾亲读此书，还特意购买数十册，赠与身边的孩子、友人和外国政要。回过头来看，日本能在明治维新之后一

代人的时间迅速崛起而免于被列强过度打压、妖魔化，不能不说拜《武士道》之所赐大焉——一本《武士道》对国家“软实力”的诠释，胜过无数政府公关和白皮书。

其实，说起武士道，日人首先想到的，未必是新渡户的《武士道》。前有经典文本、被视为武士道“圣经”的《叶隐闻书》（略称《叶隐》），后有三岛由纪夫切腹自戕前三年撰写的《叶隐入门》，名气都不小。表面上看，后者好像是对前者的“入门”性诠释，其实不然。三岛短促而浓缩的一生，始终执着于《叶隐》，把这本中世的典籍视为生命哲学：“我沉醉于《叶隐》的教导，泥足深陷而不肯自拔”；“……《叶隐》对我越来越有意义，我对身践力行《叶隐》的教导，迸发并灌注了我全部的激情”。在三岛看来，《叶隐》哲学包含了三个面向：向死而生的哲学、行动哲学和爱情哲学——而这三者正是三岛文学的主题。事实上，他在写作《叶隐入门》之时，已然确立了“殉道”的意志。而所殉之道，就是武士道。

与这两种“叶隐”相比，《武士道》毕竟是以洋人为对象的“启蒙”性文本，处处可见对西人接受程度的体恤。稻造从盛行于欧土的骑士道(Chivalry)切入，端出“武士的训条”(即武士道)及其渊源，并像层层剥笋似的，一一诠释义、勇、仁、礼、诚、忠、名誉、克己等价值元素的内涵。尽管是英文原创的文本，字里行间却贯穿着东洋特有的美意识。作者引用本居宣长的和歌“若问敷岛大和心，旭日飘香山樱花”，来表现樱花所代表的“大和魂”



《武士道》
(日) 新渡户稻造
张俊彦 译
商务印书馆
1993年2月第1版

与西人所赞美的“带刺的蔷薇”之迥异、之无常：

我国的樱花，在它的美丽下面并不潜藏着刀刃和毒素，任凭自然的召唤，随时捐弃生命，它的颜色并不华丽，它的香味清淡，并不醉人。……那么，这样美丽而易散落、随风飘去、放出一阵芳香便永久消逝的花朵，不就是大和魂的典型吗？日本的魂就这样脆弱而易消逝吗？

在新渡户看来，武士道是一整套武士遵循的道德原则，“它并不是成文法典。充其量只是一些口传的、或通过若干著名的武士或学者之笔流传下来的格言。毋宁说它大多是一部不说、不写的法典，是一部

铭刻在内心深处的律法”。但惟其是“铭刻在内心深处的律法”，它带有很强的禁忌性和实践性：“武士道，如同它的象征樱花一样，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朵。它并不是保存在我国历史的植物标本集里面的已干枯了的古代美德的标本。它现在仍然是我们中间的力量与美的活生生的对象。”义、勇、憎恶卑怯、恻隐之心……诸如此类的价值取向，既是人们心中的道德约束，同时也意味着一种禁忌，并伴随某种惩戒。每个人都相信，如果不遵循这种约束，严苛的惩罚必至，甚至是灭顶之灾。

当代作家藤原正彦在其名著《国家的品格》中，也曾谈过这个问题。藤原从小就被其父告诫：“见到弱者被欺负的场合，要挺身而出，帮助弱者”。否则的话，就是“卑怯”，从而丧失了“活着的价值”。在明示“搭救弱者时，可动用实力”的同时，却又告知“五戒”：1、大的不能打小的；2、众人不可打一人；3、男不可打女；4、不可操武

器；5、当对方哭泣、道歉时，须即罢手。

一般来说，日本孩子极少有小偷小摸的行为，这也是武士道精神内化为人自身的内心戒律的例证。而这种内化，是通过强化儒教意义上的家族关系的纽带来实现的。如只对孩子说“偷人家东西犯法”的话，那么只要周围没人看着，孩子可能还是会偷，而长大成人后，更养成一种“只要不违法，干什么都可以”的自我放纵意识。但维系于被强化了的血缘家庭纽带的孩子，从小被灌输的是诸如（如果偷人家东西的话）“会让父母因羞耻而哭泣”、“在祖先的脸上抹污泥”，或“老天爷在看着你”等道理，因此，即使没人看见，孩子也会自律。

相反，对于曾几何时日本滑向欺辱、侵略邻国的历史错误，藤原认为：那恰恰是因为武士道精神在昭和初期的“衰退”，才犯下的“卑怯”的“蠢行”。因为在武士道的理念中，欺人者，不仅不是强大的标志，反而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卑怯”。**Q**



伏尔加河畔的罗素



罗四鸫

1920年夏天，伏尔加河畔，正在俄国考察的罗素“开始意识到我们西方思想中的弊病是多么的严重，而布尔什维克正处心积虑地把这一切强加给亚洲人民，他们的做法与日本和西方正在中国着手进行的做法别无二致。”他一边听着那些“满脑子都是简单易行的理论”的旅伴的争吵，一边听着俄国农民“一些忧伤的歌曲或是旋律久久不散的波莱卡音乐”，心中充满疑惑的痛苦：“西方文明的希望日显苍白”。就这样，对西方文明备感失望又对布尔什维克表示怀疑的罗素来到了中国，来到了他赞赏的老庄哲学的老家寻找希望。

无疑，期待在中国找到西方文明希望的罗素，会让他称之为“少年中国”的“五四”新青年感到失望的。

俄国考察归来不久，1920年10月12日至1921年7月11日，48岁的伯特兰·罗素受梁启超、北京大学教授傅桐等联名邀请，与当时的女友荳拉·勃拉克一同来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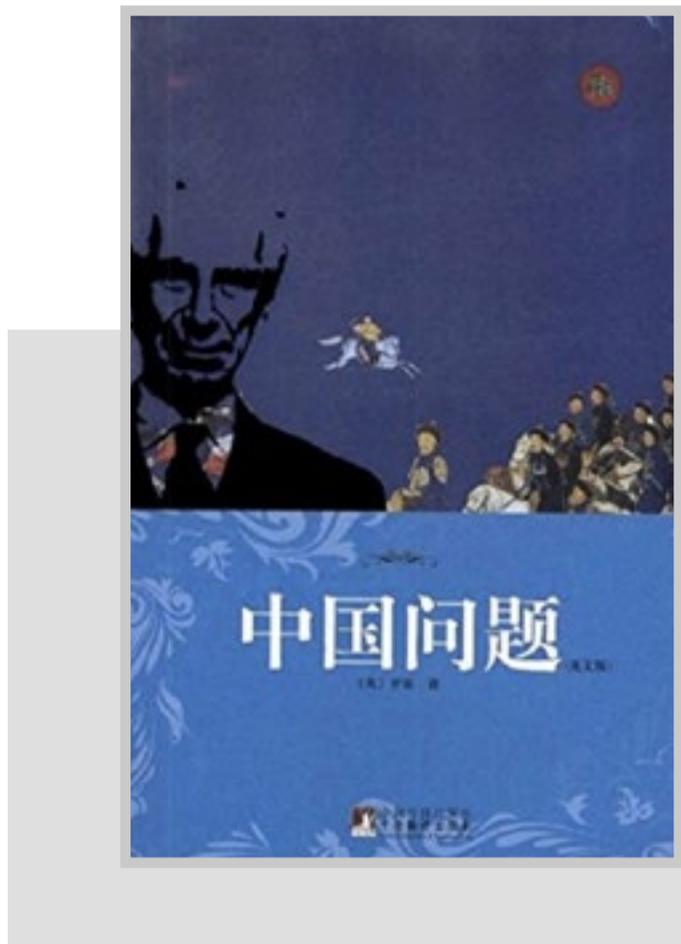
进行了为期9个多月的访问。当时，就连大名鼎鼎的杜威也对罗素推崇有加，认为罗素是比他还厉害的哲学家。在他来华的前几个月，他的著作、生平以及思想得到集中的介绍。不过，当时中国新青年期待的似乎是一位“世界社会改造理论的指导者”，而不是世界四大哲学家之一。这一点，罗素在来华之后第六天便已感受到，他在给英国友人的信里说到：中国听众不要技术哲学，他们要的是关于社会改造的实际建议。

罗素给了什么建议呢？据学者统计，在中国期间，罗素先后在上海、杭州、南京、长沙、北京等几地就18个议题做了57场演讲（2004年出版的《中国到自由之路：罗素在华讲演集》中收有16篇），但直到离华前，在北京教育部会场发表告别演说《中国到自由之路》时，罗素才说出自己的中国社会改造之路：采用“俄国式的方法”，走“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这让起

初对罗素只是冷淡的自由主义者胡适，忍不住讥讽了。在罗素离开中国不到一个星期，胡适便写了一首诗《一个哲学家》对其进行讽刺：“他自己不要国家，但他劝我们须要爱国；他自己不信政府，但他要我们行国家社会主义。他看中了一条到自由之路，但他另给我们找一条路；这条路他自己并不赞成，但他说我们还不配到他的路上去。他说救中国只须一万个好，但一两‘打’也可以将就了——我们要敬告他，这种迷梦，我们早已做够了！”

在我看来，胡适的诗虽然直白，但非常准确地概况了罗素当时矛盾的思想，也可以说极其简练地概括了罗素所写的唯一一本有关中国的《中国问题》内容：罗素试图糅合东西两种文明，为中国找到前途。在深感西方思想弊病之后，罗素对中国文明以及安贫乐道的中国轿夫赞赏有加，甚至认为“中国更长于维持稳定而不是进步和变革。”而1920年的“少年中国”们则大多认为“西方工业文明是存国之本”，他们甚至“用赞赏的眼光来来看待秦始皇当年收拾那些老学究的反动行径。”因此，罗素不受待见是可想而知的。有趣的是，在这本书的结论《中国的前途》中，罗素却对这些“少年中国”寄予厚望，并认为留学生团体还必须出现有影响力的领袖，这种领袖“既需智力超群又需具有实干精神”。而他所举的例子恰恰是胡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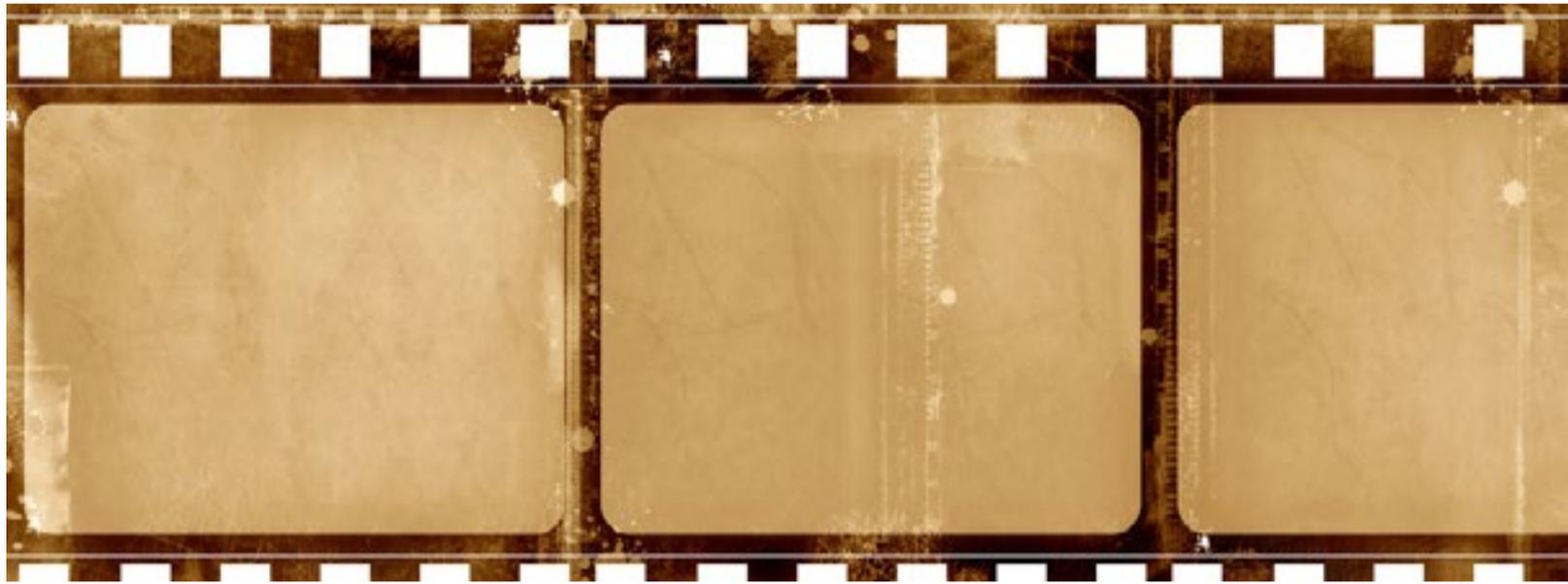
“中国现在确有如此才能的人，举一个我认识的人作例子：胡适博士，他学问精深，长于文学艺术，性格活跃，积极致力于改革。他所写的白话文激励了不少进步的



国人。他主张吸取西学之所长又不沦为西方文化的奴隶。”胡适是罗素书中唯一提到名字的“少年中国”的代表，可见其在罗素心中地位不一般。可惜，老师杜威推崇，弟子胡适并不卖帐。不仅自由主义者胡适不喜欢罗素，其对布尔什维克的怀疑也让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对其表示不满意，就连其最大的粉丝张东荪也怀疑起自己的偶像是在说“梦话”，“对于中国情形毫无所得”。再加上几乎让罗素命丧黄泉的肺炎，罗素的中国行几乎可以说在不愉快中结束。

1966年，此书再版，在前言中，罗素说到：“尽管本书写于1922年，其间43年中几乎没有什么事情保持原封不动。……我觉得书中不是谈时事的部分，总的说来仍然是正确的。我要特别指出的是传统中国人与西方各民族之间性格的鲜明对

比。”如今，又过去了48年，其间又几乎没有事情保持原封不动，时间早已经将当时的纷争与时事变成了历史，不管罗素当年的判断正确与否，不管那条路是否通往自由，不过这本小书依然值得一看，哪怕只是体会一下伏尔加河畔罗素的痛楚与孤独：“我终于开始领悟到所有的政治都是咧嘴而笑的恶魔造成的，他教唆那些精力旺盛，头脑灵活的人去折磨那些逆来顺受的广大民众，以夺走他们兜中的钱财、手中的权力和脑中的思想。” 



夏佑至

1972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尼克松访华的消息。通栏大标题“毛泽东主席会见尼克松总统”下,登载了前一天的会见简讯,接下来是竖排消息:“美国总统尼克松昨日到达北京,周总理设宴欢迎尼克松总统和夫人”。版面左侧自上而下配发了三张照片。最上和最大的是毛泽东和尼克松握手的照片。这张照片的构图近似方形,毛泽东面带微笑,神采奕奕。接下来是一张狭长的全景照片,照片上的人物,从左至右,分别是周恩来、唐闻生、毛泽东、尼克松和基辛格。

和特写照片相比,全景照上的毛泽东非常衰老。他倚坐在沙发上,体态臃肿,眼皮松弛,眼神浑浊,看上去注意力不集中。这两张照片都是在毛泽东著名的书房里拍摄的。第三张照片拍摄于首都机场,尼克松刚刚走下专机舷梯,快步走向在地面等候的周恩来,向他伸出手去。周恩来伸出残疾的右手,停留在一个恰如其分的位置。

他穿着大衣,风度甚佳,面容严肃而憔悴。这张照片流传甚广,而且颇为讽刺,人们很容易想起1954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日内瓦万国宫拒绝和周恩来握手的传说。

三张照片都出自刚刚去世的新华社记者杜修贤之手。杜修贤从1960年开始出任中南海摄影师,一开始专门拍摄周恩来(发给杜修贤的胶卷一角印有数字3,因为周恩来在党内排名第三。周恩来后来给杜修贤起的外号叫“杜三”,可能只是巧合),10年后同时为毛泽东拍照,直到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去世。这样的经历,即使在中南海摄影师里,也是绝无仅有的。杜修贤不可避免地会闻一些中共历史上关系重大但罕为人知的时刻。“文革”结束后,他受到长达四年的审查。几乎所有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后来都成为出版界追逐的对象,杜修贤也不例外。他先后出版了几本书,接受过一些访问,但给人的印象是,他宁可守口如瓶,并为自己经住了讲述往事

的诱惑而骄傲。

少数照片背后的故事之所以为人所知，是因为这些故事不但正确，而且故事本身还能强化正确的观念，并为正统历史叙事提供了更多细节和证据。最有名的是八名政治局委员在毛泽东遗体前合影的故事。1976年9月12日凌晨，杜修贤被召入中南海，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和汪东兴依次绕毛泽东的遗体一周，最后站成一排合影，其中一张合影上，八个人手挽着手，如同在毛泽东的遗体前组成一面人墙。这个创意实在别出心裁。杜修贤觉察出这个组合不同寻常，但仍然一如既往，顺从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并按照要求，把照片小样送给江青供其挑选。他一直保存着八个人手挽手站在毛泽东遗体前合影的底片。清查他与“四人帮”的关系，要求他上交所有照片、小样和底片时，他隐匿并转移了这张底片。

杜修贤危险而高超的自我保存技巧令人叹为观止，也从另一面说明了官方摄影师的职业性质。在现代极权构架中，政治象征并不是权力的镜像，它们就是权力本身。杜修贤和其他中南海摄影师，名义上最重要的任务是为党拍摄、制作和保存视觉文献，但谁掌握了历史，谁就能控制未来，争夺政治象征的竞争和夺取权位的竞争一样残酷而激烈。

中南海摄影师的作品并不是历史的记录，而是历史的底稿。所谓底稿，意味着它们将被不停地修改，直到最终形成官方版本的历史叙事。以1972年2月22日《人



民日报》头版刊发的三张照片为例，与尼克松握手的毛泽东和倚坐在沙发上的毛泽东，体态神情判若两人。特写照片显然做了更多的修改，以至于照片的光线和毛泽东的表情变得非常不自然。第三张照片上，周恩来背后身材高挑的翻译冀朝铸被抹掉，换成了王海容。王海容是毛泽东表哥王季范的孙女，当时任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

2009年，英文版《中国日报》刊载过一张书房会见的特写照片，画面上只有坐在相邻沙发上的毛泽东和尼克松两人。毛泽东注视着尼克松，右手扞住沙发扶手的末端，左手虚捏着拳头，无力地搁在另一侧扶手上，袖子完全盖住了手腕。和庞大的身躯相比，毛的双手小得不成比例。日

后发表的照片可以说明那些作为底稿的照片被修改的标准和程度，但它们本身作为文献的可靠程度仍然很可疑。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藏底片大概是摄影师的本能，是他们职业生涯里不可缺少的一课。在杜修贤的一生中，可能只有那张藏起来的底片，避免了作为历史的底稿被任意修改的命运。

“政治评论家们已经指出了世界现代史中出于政治目的对照片的屡屡篡改”，美术史家巫鸿说，这种篡改并非偶然个案，“而是官方摄影的一个基本和内在的机制”。他甚至不无温情地说，修改如此精心，甚至让后世的观众为之感动。说实话，这类感动是我完全无法理解的事。🔴



何以解忧？惟有跑步！



吴强

仅仅几年间，跑步就蔚为风潮。记得还在五、六年前，TNF在北京第一次办越野跑比赛的时候，跑者多是习惯晨跑的工人，所谓“群众体育”的活化石，还有就是户外爱好者群体，他们不过是长跑的菜鸟。但突然间，跑步几乎改变了北上广的城市景观。

一些著名地产商围着自己的楼盘跑，到波士顿跑马拉松，连带晒他们的果蔬汁、登山心路、和手制红烧肉；微信朋友圈里，跑步路线、跑步时看见什么、想些什么、撞到谁，也俨然成了标准的刷屏内容；每周相约奥体公园、参赛马拉松、彩粉跑，更成了北京新新文人、新新中产们跳出宅男女生活、跳出小圈子的一大热门选项，也难得地开始与官方主办的公共活动互相交叉碰撞。以致于，从早到晚，北京的奥体公园总是人满为患，即使雾霾天也不例外。其实，公园内的十公里跑道只铺了一层薄薄的塑胶，跑感并不好，跑者若想畅快

地跑完全程，并不容易。

到底发生了什么？通常，每一种新生活方式浪潮出现的背后都有其社会经济或者政治原因。例如，70年代初期，小文革结束，9·13事件过后，人民的政治热情褪去，开始追求世俗生活，男打家具、女打毛衣的风气便流行开去。至今很多城市平民家里保留下来最多的老物件，不是明清家具或者瓷器，而是一水的72条腿。笔者去年曾经参观上海青浦的陈云博物馆，对其中收藏的陈云在中南海用过的家具印象尤深，无他，其款式、木料和油漆非常熟悉，正是典型的70年代风格。当时城市的普通家庭，这一自发的DIY风潮，几乎复制了中南海的家具样式，可说相当程度上破除了个人崇拜和政治狂热，自发创生了一个改革前的实用主义的社会气氛。

再有，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各种“靡靡之音”随之进入每个家庭，而渐渐形成的一大城市景观便是市民围看电视剧

的热潮。只不过，每个周末，旧式邻里街坊在一个四合院里共同围看的不是审判四人帮，而是从《加里森敢死队》到《血疑》、《排球女将》到《渴望》。这是人民收入增加、文化市场放松管制的结果，带来电视传播的普及和电视消费的热潮。当然，这个消费热潮最后以那场所谓的风波结束，一场依靠电视传播的社会运动虽然失败，却也终结了传统的单位制集体生活和旧式的邻里社区结构。

而新近出现的长跑热潮，以北上广这些特大中心城市为最，跑步人群又以新兴中产阶级为显著，其背后反映了何种社会经济政治变化，或者暗示着何种即将到来的变化趋势呢？直观上，会有人猜测，这一风潮或许是大都会新兴中产们追求健康和活力，向肥胖说不。的确，如果以BMI指数超过25算超重的标准，从1992年到21世纪初的十年间，中国的成人超重率上升39%，临床肥胖率上升97%。更有肥胖问题专家预测说，到2015年，中国的肥胖人口将超过两亿。按照这一趋势，到2025年或者30年，中国的GDP或许未必赶上美国，但胖子的规模却可能超过了。

按《富态：腰围改变中国》一书作者弗伦奇和格莱博的说法，肥胖，既是新兴中产阶级出现的标志也是结果：一个阶级的肥胖背后，是不健康的消费模式、生活方式和社交形式，也是这一代新兴阶级的忧虑。相比欧美市民50%左右在家吃饭的频率，这些中国新兴市民阶级只有平均20%的在家吃饭机会。传统的中式狭窄厨房，不仅限制了共同在家吃饭、共同交流

的机会，也继续强化了家庭内部不平等的分工，甚至诱发了过度饮食，以致于普遍的肥胖。当然，新兴中产中另一部分如白领阶层和更接近中下阶层的宅男女们，他们的过度工作模式、缺乏社交、依赖方便食品、城市公共空间被过度商业化等因素，也都是肥胖的原因。

对肥胖以及肥胖背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社交方式的焦虑只是其一，还有形形色色的对地沟油和奶粉的食品安全焦虑、对子女入托、上学、高考的阶级再生产焦虑、和对医疗、退休金的福利焦虑，对楼市不稳、对法治缺乏信心、对大气污染恐惧等等的财富焦虑、环境焦虑和政治焦虑等等，集中体现为整个新兴中产阶级的集体焦虑，笔者早先有文专门论述。特别是面对威权理论各种对思想市场的钳制、对经济自由的限制和盘剥、对人身权利的压制，中产阶级的集体焦虑，几乎幻为人之初的阉割焦虑，不得不退回儿孩状态，行为和思维都趋幼稚化。

而最近神经科学的研究，对焦虑成因有了新的发现，或许为摆脱焦虑找到了一点希望。它的理论起点可以追溯到近代的一个神经科学教条，即成年后人脑的神经细胞不再增加，只是不断死亡，不能再生。但是，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有科学家不断发现新生神经细胞的现象，尤其在影响学习、认知、记忆和情绪的海马区。90年代随索尔克生物研究所发现成年小鼠的新生神经元后，这一研究引发了极大关注。有趣的是，这一时期，不仅是神经科学对阿尔氏海默症等研究进展最快的时期，

也是纽约等大都会长跑热潮兴起的时期。最新的，则是霍普金斯的亚萨和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德川前团队证实了，焦虑的根源来自海马区齿状回区域，如果新生神经元不足，则神经活动过于活跃而将记忆混淆，阻碍大脑的“模式区分”，难以区分相似场景进行逻辑归类，也就是记忆的“泛化”引发焦虑。

比如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老兵，常常因为无法区分现实生活中的和平草地与杀戮战场、都市黑夜与战场黑夜而引发恐惧。还有中国忧虑的中产阶级们，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必须日复一日地忍受排队挤地铁、受安检、开车堵在路上、走路须戴口罩、办公室须忍受无条件加班、各种地位差异和人身依附、尊严丧失殆尽的羞辱，上述集体和阶级的焦虑在日常生活的各个相似场景中被反复地强化。作为正常人，只要认真对待这一切，便几乎不可避免地可能产生一种错觉，因为无法区分上述各种焦虑模式，而陷入反应迟钝、无意识、和记忆消失。相形之下，最快乐的倒是那些从每隔十几年就一轮的反腐打老虎中看出民主改革希望的人们，他们的心理和生活大概都更接近上层统治阶级，享受着或者幻想着有特供粮油，坐车有警车开道之类。

而缓解焦虑的方式，就是刺激新生神经元，抗抑郁药物百忧解的功能之一便是如此。类似的，对白鼠跑轮的发现也证实，跑步和体育锻炼能够刺激海马区的新生神经元，然后改善小鼠的认知，减轻焦虑。所谓生命在于运动的古训，跑步让人快乐的

鸡汤，因此得到证实。

不止于此。如果追溯跑步与人类文明史，就能发现，是跑步将猿变成了人，并且实现了迁徙和人种与文明的扩散，甚至因此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包括男女间关系和女权社会与男权社会的更迭。根据宾州大学雅布隆斯基的理论，人类最初是通过狩猎和迁徙过程中的跑步，才得以逐渐进化，比如增大的下肢关节和适合奔跑的较短的脚趾头，并形成灵活的腰部，包括谢亚龙执掌足协主席期间特别强调的髋腰肌的训练，这是中国男女足运动员最大的身体缺陷；还有较直的上臂骨，和朝向侧面的肩窝，而不是猿猴总是上举准备随时攀爬的向上的肩窝。这些进化极大增加了人类的上肢活动区间，解放了上肢，双手的技艺得以不断进化，同时刺激了大脑的扩大。而更重要的，还是跑步所需的体温调节帮助人类发展出一套皮肤冷却系统，被毛得以逐渐褪去，也因此永远脱离了野兽的序列。事实上，人类是哺乳动物中最善于长途奔跑的，例如每年一度的北美弗蒙特100英里越野赛，选手们能够在24小时内跑完全程，持续奔跑能力超过任何马匹。

在不断狩猎、驱赶和迁徙的过程中，男性的跑步基因随Y染色体而传续，男性也渐渐因为具备穿越地理情境产生的复杂认知和记忆能力而不断刺激神经元增升，脑容增加，权力也随之扩大，原本属于采集和种植的女性权力却不断下降。最终，善于奔跑的非洲移民在三万年前统治了世界。但是，另一方面，几乎随着人类定居文

明开始的同时，男性Y染色体也开始了退化、变短，Y染色体特有的男性基因逐渐被X染色体共享。其后的人类历史，便是善于奔跑的民族如何捍卫民主或者游牧民族如何征服农耕民族的故事。通常，这些善于奔跑的民族通常也比较快乐。到今天，越来越多的女性都已经分享了男性的基因，包括奔跑基因，男女的社会性别差异因此不断缩小，尽管在一些限制人们自由奔跑的国家里，这种男女间的不平等还是显而易见，因为不平等而产生的威权主义也时时刻刻再生产着各种焦虑。

在这种情形下，如同任何一个系统的更新都依赖内部新系统的创生，摆脱焦虑的唯一方式既是个体的也是集体的。就跑者个人而言，每个人，加入跑步的行列，无论在健身房的跑台，还是户外公园，都意味着一种向积极、健康生活方式的转变，并且随着多巴胺的分泌，同时刺激着新生神经元，改善着个体的焦虑。例如，在多地马拉松比赛领跑的@花椒毛豆，自然成为跑者心目中的女神，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宅男女们加入马拉松行列。而领跑的企业家们，如潘石屹和王石，甚至因此进入公知的行列，他们的企业也被想象为良

心企业。甚至，北京另一群社运的领跑者，如老莫和他的朋友们，去年此时，从京西40公里处的潭柘寺一路跑进天安门，几乎随时就能感受到奔跑带来的身体解放，大脑分泌的多巴胺在一点一点清除着威权下的无力感、模式认知混淆、和记忆泛化等等焦虑。

而当风潮兴起，这种貌似孤独的运动，却可能大大增进社交，结果便成为一种阶级意识觉醒的集体行动。比如，当公民们习惯于奔跑穿梭在城市的道路，自然而然地将更加热爱他们所生活的城市，也势必对各种城市公共空间被商业化所占有、被各种维稳栅栏所分隔、尤其是行人和自行车道路被压缩更加不满，从而对城市产生更多的批评，提出自治的要求。特别的，在城市穿梭逡巡奔跑，对城市跑者神经元的生长刺激和记忆深化，以及城市探险一般带来的分享，胜过任何一种手机地图带来的熟悉感、空间感，从而增强智力的优越和实际的占领感，仿佛新的城市游牧民族，如同北马选手每年一度在新华门的红墙外撒尿一般，如同罗拉快跑一般，可能挑战并且改变陈旧腐朽的城市景观。

何以解忧？惟有跑步！



罗四鸽

到波士顿没多久，我突然决定到哈佛广场去支一个小摊。于是，一夜无眠。第二天一早，两眼放光跑去哈佛广场做我的商务考察。我害羞地在哈佛广场转着圈，每转一圈，就害羞地和站在COOP书店门口的Bruce打句招呼，转完三圈之后，我决定把他当做我地摊生意的领路人。于是，我假装自己是精明的不刁烟斗的胖神探波洛，神闲气定地从他那里打探信息。

因为Bruce也在哈佛广场支了一个小摊。

不过，Bruce的地摊有些特别。他那个简陋的摊子上，放着各种与《圣经》有关的书和小册子。我问：“这是什么书？”这招本叫醉翁之意不在酒，谁知，却像《冰河世纪》里那只小麻烦鼠精，只是想抓住一只小橡果，却引起一连串的多米诺骨牌，最后是地壳崩裂了。所以，可想而知这个问题所带来的结果：Bruce将四个版本的《圣经》打开，举例说明四个版本的异同。接着，他又翻开一本更大更厚的

《Strong's Exhaustive Concordance of the Bible（史特朗经文汇编）》，告诉我《圣经》里的每一个单词都可以按字母顺序在这里找到。嗯，这其实就是一本《圣经》字典。待教会我如何使用这本字典后，他又抬出《The Companion Bible》和《Jamieson, Fausset and Brown Bible》，分别是三册和四册，唬得胖波洛汗流夹背。虽然，在此后三年里，我不止一次抬出这三个书名来长自己的威风，但关于如何摆地摊，那天下午我一句都没问到，只是多了几本Bruce自己写的小册子，上面有着各种《圣经》小知识问答。对的，他的工作就是站在那里，回答路人对《圣经》的各种问题。他还有一个网站，用电子邮件回答来自世界各地的《圣经》问题。

Bruce是不是职业牧师？我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但每周有好几天，他都准时出现在那里，带着几分有教养的微笑，守着他的

《圣经》摊子，回答路人的问题。后来，我在他的《圣经》摊边设了半天的摊子，装模作样卖着我的手工艺品，然后和他聊天。Bruce的顾客真多真欢乐。一对黑人情侣手牵手过来，讨论热烈而欢畅，最后三人击掌而散。Bruce对我说，他们是满意而归的顾客。而我的地摊冷清得仿若是隐形的。出摊一次后，我便鸣金收兵、金盆洗手、散发江湖去了。所谓一山不容二猛虎，一地不容二摊主。不过，每次去哈佛广场，我都会看下Bruce，若是他在，我都会过去会会他。

有一次，去哈佛广场附近参加圣诞party，路过书店门口，天啊，那么冷的天，Bruce依然站在雪地里，在那举着那张硬纸板。那时，天已黑了，可是在路灯下，他的笑容比夏日初见时更灿烂。正奇怪，他突然伸出手给我看：“I am married（我结婚了）。”胖波洛又唬得汗流夹背。正疑惑着，便看见那位和他笑得一样灿烂的新娘站在前面不远处，给另一位妇人秀她的婚戒。其实，美国也有很八婆的人。那位妇人便是。一边大叫恭喜Bruce和他的新娘，一边如过年开门红那一万响的鞭炮，把Bruce和他新娘的故事噼里啪啦地全抖出来了。

原来Bruce的新娘来自澳大利亚，他们是通过Bruce的网站认识的，在通了几封邮件之后，Bruce的新娘便决定从澳大利亚来见Bruce。两人未见已钟情，一见定终身。前后21天。“这是他们两个第一次结婚，Bruce五十多岁了，他的新娘四十多岁。”那八婆强调，然后怂恿着Bruce吻

他的新娘。Bruce和他的新娘笑得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果真当街亲吻，且一吻再吻三吻，止都止不住了。我害羞了。他们两人却笑了，我从未见过如此清澈的笑容。

自此，Bruce失踪了，这让我经过Coop书店或是看《圣经》时，总带着胖神探波洛的狡黠微笑。有一次，在地铁市政中心站从蓝线转到绿线等车，L问我，你笑什么。L是地铁站的卖唱艺人，每次有中国姑娘路过的时候，他就唱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没跑调，但总掉词，听上去怪怪的。这个我当然不会告诉他。不过，他却告诉我，曾经在蓝线上的中国人最多，现在转到橙线上了。我问：“你怎么学会唱邓丽君的歌？”

结果，小橡果再次引发地壳崩裂。L拿出钱包，掏出一张很老的照片，很显然，照片里那个男的是年轻时候还没有秃顶的他，非常帅气。而那位女的，是一位中国女孩。L说，我没有身份，我没法和她结婚。L还是孩提时候便随父母入境，非法滞留，虽然他可以在美国上学工作，但他没有身份，他也无法给那位女孩身份。

后来我搬离了蓝线，几乎再也没看到L了。有一次，我从橙线转红线去哈佛，还在通道中就听到一个男的一声一声骂：Fuck U。说实话，因为文化隔阂，我对这个词的感觉其实和Love U的感觉其实差不多，但那个气势足可以把见识过各种惨案场面的胖波洛吓坏。我也如此，所有的人都如此，吓得远远躲着那位男人。那个愤怒的强壮的男人，穿着老头衫，光头，光胳膊上露着狰狞的刺青，啤酒肚挺的老

高，一边喊一边挥动胳膊，一声比一声高，一个人站在站台上，狠狠骂Fuck U。我们这边站台上的人都远远躲着他。我想，这个时候，即便是胖波洛神探去阻止他，他也会毫不犹豫地 将胖波洛扔下地铁站台的。胖波洛再精明，估计是无法在两分钟内从地铁里再爬上高高的站台的。因为地铁还有两分钟就到站。

终于，对面站台上，有一个人忍不住了，回骂：Fuck U。

于是，这位男人又回应一声更高的，并因为找到了谩骂的对象而骂更猛。对面的男人又回应一句更高更猛的。于是两人F来，F去，地铁里好斗的雄性荷尔蒙激素顿时增高，世界大战一触即发。幸亏，对面地铁来了。对面的骂声没有了。可是这位男人依然气焰嚣张，竟然更起劲，跳了起来，

骂不绝口。

此时，我们这边的地铁也要开过来了，地铁工作人员总算出现了，走过去，礼貌地提醒那男人注意安全，不要超过黄线，小心掉下去。

突然，那个男人的声音变了，对地铁工作人员说：“Do you know, my wife is dying in the hospital (你知道吗？我老婆在医院要死了)！”

工作人员依然很冷静：“Man, be cool。(冷静，兄弟)”

那男人声音变得更厉害了，我觉得他是哭了：“My wife is dying now (我老婆她要死了)……”

那一天，我钻出地铁，一眼便看见许久不见的Bruce站在Coop书店门口，举着那块纸牌，清澈地笑着。Q



让-雅克·阿诺

其实我一直都在拍同一部电影



灵子

让-雅克·阿诺 (Jean-Jacques Annaud) 满头白发，戴一架圆镜片眼镜，看上去一副典型的法国严肃知识分子的模样。但一旦他开口说话，那手舞足蹈的兴奋样子会让你立时忘却刚才的印象，并且忘记他今年已71岁的年纪。他会就一个话题侃侃而谈天马行空，其间他会模仿猩猩或水牛的样子，或者装出杜拉斯低沉嘶哑的嗓音，然后报之以爽朗大笑。他看上去那么精力充沛，对所有近在身旁和远在天边的事情都抱有强烈的好奇，谈话里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是“着迷” (fascinating) 和“兴奋” (exciting)。

无怪乎他可以拍出题材、风格跨度那么大的电影，《玫瑰之名》、《情人》、《兵临城下》、《熊的故事》……许多观众不知道这些耳熟能详的片子原来出自同一人之手。还有一些不那么为人所知的，《火



之战》，讲述旧石器时代远古人对火的追求，全片没有台词，全靠行为与动作推动剧情，后来获得最佳影片与最佳导演奖；而他的第一部剧情长片，拍摄于非洲的《黑人为白人而战》（Black and White in Colors），更是一举拿下当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且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奥斯卡青睐的非洲电影，这让这位此前以拍商业广告闻名的导演一开局就站在难以逾越的高峰。

但他当然逾越了。在之后的职业生涯里，他不断以充沛的热情与强烈的好奇在天南海北汲取素材，从中世纪修道院的宗教生活（《玫瑰之名》），到上世纪初越南法国殖民区的东南亚风情（《情人》），再到1930年代阿拉伯地区酋长们之间的争斗（《黑金》），以及他一贯的对于荒野中动物世界的热情（《熊的故事》《虎兄虎弟》），后者直接延续到他如今正致力于后期制作的、改编自中国作家姜戎同名小说的《狼图腾》。

我试图将他钟情的电影题材归结为两大内容：历史与动物。他大笑，然后轻声说：“其实我更愿意将它们称之为人性。”

我关注的是爱与战争

问：你的电影涉及的题材非常广阔，无论是从时间还是地域上说。在你看来，这些题材的共同点是什么？

阿诺：我想我大部分电影都有一个核心主题，通常是一个年轻角色遭遇人生的重大转变。

问：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主题？

阿诺：我的很多作品是被我年轻时候的经历所激发。我在巴黎长大，是典型的巴黎

年轻学生，学习电影、希腊语和古代历史，二十多岁突然被送到了非洲，要去喀麦隆拍电视节目。那种全新的发现和爆炸式的感受带给了我一个巨大的转变，真是巨大的冲击。我想如果不是那次强烈的体验，我不会成为现在这个我，不会成为现在这样的导演。这是我职业生涯里决定性的一步。所以我喜欢将我电影中的角色放在一个即将转变他的环境里。比如《兵临城下》就是如此啊，一个小伙子，不知名的牧羊人，有一天突



然成为自己国家的英雄。其中决定性的事件无疑是那场漫长的战场。《狼图腾》依然是如此。它是讲一个从北京来的年轻人如何因为与蒙古的接触而彻底改变人生。这与我个人的经历很相似。

我想我其实是在试图掩盖我一直都在拍同一部电影的事实。(大笑)。所以我选择了完全迥异的时空,不然我就成了拍自传。当然也有不少导演从自传起步,因为毕竟你最熟悉你的父亲、你的姐妹、你的表兄弟。但这些是我想极力避免的,因为即便你试图从不同角度来剖析,你还是始终在讨论你自己。电影制作人、小说家都很容易变得自我中心,我想尽力避免这种情形。

问:也有很多导演一辈子就在拍一类电影,或者说,根本就是一部电影。比如我很喜欢的法国导演侯麦,他的作品几乎都是同一部,有关爱情的萌动,以及对爱情的思索与探讨。

阿诺:如果你是个真诚的导演,这又是你觉得惟一合适的方式,那就忠于你自己。有些导演可能倾向于在一个空间里分析一个角色,这也会变得很迷人。我更喜欢另一种。我喜欢逃离,喜欢做梦,喜欢从我熟悉的文化中抽身出去,离开自我,去尝试理解他人。这是我人生的一大乐趣。我的电影就是在反映这些。有些人愿意分析他们自己,近距离观察自己。我也是,但我要通过更丰富的体验来实现。没有一定之规,我只是选择了我能做到的。但我也尊敬其他方式。

问:通常你选择剧本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故事会打动你?

阿诺:我很依赖直觉。可能是报纸上的三行字,可能是电梯里你讲给我的一个故事,其中某些元素激发了我的兴趣,什么东西或者什么地方让我内心觉得“好,我可以花十年在这事儿上”。你知道我拍一部片子一般至少要花三年时间,所以我得要足够有激情,才能让自己不去想这到底要花掉我多少时间,我得付出多少努力。你知道恋爱中的人是什么样子,不管你的恋人在哪儿你都要见他,哪他在安第斯山顶上,哪怕你要坐一夜飞机或者在火车厢里过夜,你完全不在乎,你只想见他,因为你爱他。这就像我的工作方式。

当然我看很多电影、纪录片,大量阅读,对许多事情有兴趣,然后某天我会突然觉得,“哇,这个很棒!”我觉得这种决定通常是我内心的直觉反应和我的兴趣点的结合。我经常都是先决定拍一个故事,之后才去分析为什么。你看,这还是像爱情,就跟一见钟情是同样的道理。你是一个女孩,你面前两个男人都很帅,但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喜欢其中一个而不喜欢另一个。

我也从不考虑这故事能不能流行或者大卖。这怎么预测?最奇怪的电影有时也能取得票房成功,这是很难去分析的。所以我倾向于相信我得直觉,跟着内心走。这简单多了。

问:是否可以将你的电影归结为两大主题:历史与动物?



INTERVIEW

阿诺：我更愿意称其为人性（human nature），但是当我说这个词的时候，有一个词“本质”（nature）在里面。我是对我们作为典型的人类的本质感兴趣，我这些年发现，这种本质是血和肉，是我们内心的直觉。很多人试图忽略这点，或者排斥，但我相信我们有同样的直觉。有时候我们想咬人，有时候我们想打架，这是对这个世界的直觉反应。

所以即便拍摄动物，我也觉得这是在理解人性。比如《狼图腾》，狼群教会我社会责任。狼的习性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东西，因为我以前研究过的熊和老虎都是独居动物，他们独自狩猎，他们心理完全不同。狼需要抱团，就像我们一样。他们需要老板、首相、警察，他们需要社会组织。看到我们与这群动物如此相像，这很有趣。于是你看待自己的公司也不同了，你开始从一种原始的、简单的方式看待公司存在的需要，从四条腿的动物的组织结构里面体会这些。

这是我为什么要拍动物电影的原因，因为这是我更好地理解人类的方式。或者，我可以说我关注的是爱与战争。我拍过好几部关于战争的片子，尽管都是从一个平静的人的生活切入。还有爱，性感的爱，平静的爱，都是非常基本的。毕竟，当你停下来看，你会发现食物与爱是你一生最基本的两大需求，而且，承认这种需求没什么可觉得丢脸的。换个角度去看，你会看到它的美丽，它的必须，它的真诚。这就变得很清楚，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渴望，是出于一种非常根本的原因，这很美妙，这是人生的本质。经过冲突——比如三个女人想要同一个男人，然后她们就打起来了——我反而感到更平和，因为我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看待它。我对自己的热情和冲动也少了惧怕。之前我对自己某些直觉有所惊慌，现在我觉得OK，我不过是一只普通的熊、普通的老虎、普通的狼。





非洲改变了我对生命意义的认知

问：二十几岁被送去非洲的经历对你影响如此之大，你当时是否觉得特别幸运？

阿诺：事实上，一开始我很排斥。我在法国上了两所重要的电影学校，就像中国北影的地位，我是其中最年轻的学生。一毕业我就有很好的工作机会，很年轻就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业导演，拍电视广告。那时候我就是个满怀梦想的年轻人，准备着拍各种各样的电影，小短片。有人付钱给我做我自己想做的事，觉得特别棒。可是突然我接到一张通知说我得去非洲。当然不！我对非洲毫无兴趣。那时候非洲对我来说就是一群人光着上身穿着豹皮裙围着火堆坐成圈儿。（笑）那时我想，我会变得很不开心，他们肯定会把我赶出去。但讽刺的是，飞机舱门打开的那一刻我就爱上了非洲，那种气味，人们行为的方式，与欧洲那么不同。

现在我每年大概会去非洲两三次，我们整个家庭都情不自禁地爱着非洲，我的大女儿成了人类学家，二女儿刚刚随无国界医生组织到了几内亚的科纳克里。我喜欢这种状态，因为非洲正是我生活的反面。我平时住在巴黎的历史中心区，一个很复杂的地方。但当我去非洲，我们就坐在蚊子的天罗地网下，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小茅屋里，周边都是山羊和鸡。多么鲜明的对比。我想，认识你是谁，在这个世界中定位你自己，在各样的文明中发现你自己，这是非常重要的。

问：你之前在一次访谈里说过，在非洲你第一次认识到“我是谁”。

阿诺：这是我到非洲第三天就发生的事。（大笑）。那时候我喜欢巴洛克音乐，那会儿这种类型还不怎么流行。我当时行李不多，但其中一个包就装着我的唱片机。我去到喀麦隆我住的那个城市的山顶上，放一张佩尔戈莱西（Pergolese）的唱片——他是非常伟大的意大利作曲家——在山顶听着精致的音乐。山下有一个非洲村庄，都是小茅草屋，可能在举行婚礼什么的。我正听佩尔戈莱西呢，下面就传来“Bang Da Bang Da Da”那种非洲鼓点。我一下子就觉得：

“天哪！我知道所有旋律，但我对节奏一无所知！”我是说，我知道一切表面的东西，但是完全不了解那种发自内心的节奏。我意识到我正在一个错误的轨道上。我本来的理想是成为一个智性的知识分子，但那时我第一次感到，我得先了解自己动物的一面，就是说，试图理解内心的节奏，试图理解血肉之间的运行机制，而不是把事物抽象化。

在非洲的日子里，我常常一个人在森林里的帐篷里待着，周围都是野生世界，树上就坐着猴子，旁边有巨鸟、犀牛，甚至有一天，帐篷外还有一只狮子！我意识到，作为一个在城市里的人我有安全感，但当我独自在丛林里，我不再是主宰者，有远比我强大的生物存在，比如，上百万只蚂蚁、蚊子、苍蝇之类的小虫子，它们远比大动物可怕，无声



无息叮一下，你就染上重病了。但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它们求生的方式，去啮食、去繁殖、去爱。真的，这影响了我对生命意义的认知。

问：你第一次去非洲待了多久？

阿诺：只有一年多，但这是足够拍一部电影的一年。我在那儿完全忘记了法国，见到这个国家从上到下不同层级的各色人群，是很难得的经历。法国大使馆常会邀请我参加一系列的官方活动，在那些活动上我遇到很多喀麦隆的政府人士和部长们，他们使我更理解了这个国家。而我在雅温得的电影制作部门里的朋友都是普通的喀麦隆人，他们每周都邀请我去他们的聚会、午餐、晚餐、婚礼……我还是一场婚礼的见证人。我跟朋友们度过了很开心的时光。

我还在那儿爱上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她是个住在喀麦隆的法国人，已经结了婚。我们经历了所有戏剧性的事情，因为她的丈夫跟踪我。要知道，他是个猎人，一个猎水牛的！我们后来只好逃到森林里去。太多有意思的事情了。她当时非常年轻，嫁给了喀麦隆最富有的法国人，而且不幸的是，这个法国人对我很友好。但是我在约会他的妻子！这很法国不是吗？（大笑）我只想说，不不不，别对我这么好。

这位丈夫来自一个殖民地家庭，有种族主义的思想传统，这真的让我恼火。但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经历，因为我得以从不同的视角看待非洲，普通喀麦隆人，这个国家的

统治阶层，以及那些实际统治着这个国家的有钱人，他们对黑人抱有的轻蔑态度让我非常愤怒。我始终不能理解种族主义，这大概是我永远不能明白的事情之一。

问：这也是你拍摄《黑人为白人作战》的原因？

阿诺：没错。我答应自己，我的第一部片子要在非洲拍、为非洲拍、讲非洲的故事。我很高兴我坚持了这一点，因为我当时已经是很受欢迎的广告导演，基本上算是欧洲的前三，另外两个是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和艾伦·帕克（Alan Parker），我们分享欧洲所有大广告的顶级市场。很多电影制作人给我合约，但我都回绝了。他们会说：

“你还想要什么？你有最有名的演员，你有钱，你为什么不想做这个？”我说：“不，我答应我自己了，非洲对我很重要，我得做点什么兑现我自己的承诺。”最终结果我很满意，因为那是发自我内心的作品，虽然找钱的经历也很痛苦。但结果是，我们是奥斯卡至今惟一颁给非洲的电影。这让我终于觉得内心平和了，好像还了欠非洲的债。我最近遇到一个法国作家，来北京的大学做演讲，他讲到完全一样的事情，他说，“我对非洲有债要还，必须回馈给这块大陆。”

我记得那时候没人愿意给这部电影投资，因为没人感兴趣非洲的故事。某种程度上制片人们是对的，因为这部片子在我的国家上映之后完全惨败，没人要看一部电影讲卑鄙、愚蠢的法国人在非洲的故事。但是他



们错误的地方在于，其他国家的人对此有兴趣。这部电影后来大获成功，商业上的成绩远远出乎我的意料。我想这某种程度上是撞运气，你知道，很多人不喜欢法国人，比如美国人，我的电影反对法国，所以在美国的上映反而很成功。这变成我职业生涯的一个奇

怪的开始，第一部电影，奥斯卡外语片奖，我一下子到了另一个层面。很快就有美国的机构找到我，第二周我就有了十个大电影制作的合约摆在眼前，然后我开始了一直要说“不”的生活。

艾柯睿智且博学，杜拉斯有趣又难搞

问：你后来为什么会选择拍摄《玫瑰之名》？它涉及中世纪的宗教史、哲学史，原著本身就很难读，充满隐喻和符号诠释，要想改为视觉表达更加困难。

阿诺：因为我读了一张法国报纸上面一篇小文章，上面说这就像一部惊悚片，中世纪一个修道院里一本希腊语的亚里士多德的书遗失了。我看到的时候就想：“这简直是为我而写的！”第一，我还很小的时候，大概七八岁，我就开始拍修道院的照片。我会去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的修道院拍照。我不信奉任何神灵，但是我知道这是人们祈祷的地方，我尊敬这么做的人。第二，中世纪正是我感兴趣的所在，在大学我学的就是中世纪历史和艺术。第三，我学习古希腊语，而我最喜欢的作家就是亚里士多德。我现在还可以读古希腊语。这多么难得，一个人写了一本惊悚小说，关于一本我非常熟悉的书，在修道院这样一个我曾经着迷了好久的地方……这简直是奇迹。

我就去见作者翁贝托·艾柯，我对他说：

“翁贝托，你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导演知道欧洲所有的修道院，读过希腊语的亚里士多德，还对你的作品如此着迷。我希望你同意我拍摄。但别着急，我希望你自愿把卖版权给我。”这是非常有力的说辞。（笑）而且，这又是一个年轻人的生活因为一件事而彻底转变的故事，多么不可思议。这不只是肖恩·康纳利那个角色的故事，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另外，自然与文化的对抗同样是其中非常重要的话题，这是书和电影都特别想表达的部分，想看看学习和知识会对人有怎样的影响。

问：艾柯后来对这部片子满意吗？

阿诺：我们到现在还是好朋友，我想这就是答案。我喜欢翁贝托的地方是，他永远告诉我“我的书是我的书，你的电影是你的电影。”他总是这么简单去理解，比如，“如果你想做一个音乐剧，那就做吧，那不是我的书，那就是音乐剧。如果你做一个雕像，取名‘玫瑰之名’，那就做吧，那不是我的书，



只是受到它的启发。这是不同的艺术，不同的表达方式。”他是非常智慧、博学的人。你选一幅名画，脱胎出一部电影，这会是那幅画吗？当然不是，这只是受这幅画启发而来的电影。

但是有时候，书的作者却很难分辨电影的归属。电影是改编自一本书没错，但是每个读者读书得到的感受都不相同，受到感染的部分也不相同……关于这个甚至有一本书，就叫《读者的参与》（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Reader），很了不起的书。很显然每个人都会选择书中跟自己相关的部分。现在我知道了，作家永远会为导演读到的和记住的内容感到吃惊。

问：拍摄《情人》的经历是怎样的？杜拉斯也是这样豁达的态度吗？

阿诺：拍《情人》是一段很有趣的经历。因为玛格丽特·杜拉斯是个很难搞的人。（大笑）。我们经历了不可思议的争吵，终于有一天我对她说：“好吧，如果要我做，我就是自由的，不能受干涉。要么你就把它交给别人。”我是真准备离开了。后来我们又达成妥协，她说，“好，你来拍你的电影。”然后她写了另一本书，很相像的一本，说，“他在拍的并不是我真正的作品，真正的作品是这本新的，我要叫它《中国北方的情人》（The North China Lover）。”但她后来对电影的结果很满意。

我们有一段蛮友好的关系，后来陷入争吵，一年都不说话，我做我的电影，再后来我

们又互相亲吻了。（笑）我喜欢这个。这也是一种经验，对我们的个性来说非常真实。她是个很暴力的女人（模仿低沉喑哑的嗓音），她总是在谈论钱，因为当她年轻的时候没有钱。她比我大很多，大概三十岁，对我来说她是一个非常非常老的女人，而且脾气又很坏，有趣又难搞。但是这仍然是你生活中不会忘记的经历。而翁贝托·艾柯是我在生活里很喜欢的一个人，我崇拜他，他是一个如此博学的人。

问：拍摄《情人》之前你认识杜拉斯吗？

阿诺：哦，不认识。我来告诉你发生了什么。那时候我的女儿们还小，一个13岁，一个12岁，我想给她们一些性教育，所以有一天在桌边我把她们叫过来，“好了，姑娘们，让我们谈谈性。”她们都不愿意听。我就对自己说，“好吧，那我要拍一部电影。”我是为她们拍这部电影，而且我对我的制片人说过。那时候我还在拍《熊的故事》。后来我的制片人买来了《情人》，对我说，“我知道你想拍一部电影，关于一个女孩的性经历的开始。”我说，“把它拿走，我不想拍这个，我可不想跟玛格丽特·杜拉斯打架。人生苦短。”

（大笑）。他就找到我一个导演朋友拍，迈克尔·西米诺（Michael Cimino），但是他没拍成。有一天西米诺跟我说：“你还对《情人》感兴趣么？”之前杜拉斯很不友好，我觉得过了这么多年她应该温和多了，我就答应了。我们互换了项目，我本来正在另一个剧本上下功夫，西米诺拿走了那个故事。结果证



明，杜拉斯确实很老了，但仍然很强势，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但是，从长远看，这绝对是完美的经历，如果要我重拍一遍，我会拍出完全相同的片子。

一部电影必须由一个人来做决定，他根据内心来决定，不然这电影就会垮掉。如果很多人都在说，“她得穿高跟鞋”“不不，她得穿皮靴子”“不不不，她得是金发碧眼”，那就太复杂了。你要依据你自己的直觉，“她是黑头发，戴眼镜，穿高跟鞋。结束。”因为这是你感受到的方式。这不是一个委员会，它得表达出你想表达的观点。

问：为《情人》选角的时候你去过中国吗？

阿诺：那时候很难进去中国，我对香港很熟悉，也非常喜欢香港。因为香港就是现代社会的混合体，而且我喜欢那种中国文化与英国文化的融合。这也是我现在喜欢这里

的原因。我喜欢今天中国的活力、创造性。那个时候，我只是去过广东，那里跟香港真是一个巨大的反差。香港很有趣，人们永远都在笑，女人们紧跟最时尚的潮流，但是在中国大陆的人完全不同。那时候我主要工作在胡志明市，每个周末都会去香港，然后就在遇到Tony（梁家辉）。那时候我正在选演员。我看过他的作品，很想见见他，但他那时候大概比较犹豫，因为要讲英文，对他来说比较难。好几个月来我想见他，他都说不在，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一打开门，看到他，说，“啊，就是他，我喜欢他，我想要他，绝对就是他！”马上就有一种很强的感觉。直到今天我还是很喜欢梁家辉。与他合作是非常非常棒的经历。我对他的印象是，完美。他是很有天赋的演员，无与伦比的职业化，也是一位绅士。一年前我还见过他，他还像以前一样，漂亮，迷人。





美国电影变了,贪婪取代了爱

问：你似乎专拣难题攻克，你是怎样评估一个题材的困难程度以及自己面对难题的能力？

阿诺：我希望剧本能实现我的梦想。我永远相信，任何问题我都会找到一个解决办法，这可能是过分的自信，但是我确实都做到了。导演的工作就是要让银幕上的画面显得切实可信，如同传统的魔术师，就像早期梅里爱的电影——他本人就是一个魔术师，他的电影也是这么做出来的。

所以当我写剧本的时候，我通常不去想这会花我多少钱，或者多难才能实现它，我只需要说：“没错，这很棒！”然后沉浸在我的梦里。等我写完，我会说“好，现在我要开始做这个，到底怎么才能实现它呢？”一个有趣的故事是，我拍《火之战》的时候，有一场戏，三个可怜人被一帮肮脏的家伙攻击，后来突然出现一群猛犸象，救了这三个人。我很喜欢这个点子！可是第二天我回到我请来的作家那儿，他给我一页纸，我发现他没有写一群猛犸象，只有一只大象带着一只小象。我说，“但我们说过要一群猛犸象！”他说，“我只写了两只，因为你要怎么才能拍一群猛犸象出来啊？”我对他说，“听着，你不是导演。那是我的问题，你不用管。实现我的梦想，写一群猛犸象！”拍摄时候我的解决办法是，租了20只大象六个月，训练他们穿上道具服装，戴上长象牙和长鼻子，一种粘上毛发的迪奥袜子。（大笑）。当然训练这些大象花了

我很多时间，但是这非常有趣。对我来说，找一种解决方案的过程，把一群大象装扮成猛犸象的经历，是非常强烈和难忘的。

问：你从未失去过信心？

阿诺：没有。每一天我都很享受。我自己都很惊讶做这个工作这么多年还会这么说，但每天早上我确实都感到热情十足。我想这是因为我非常幸运，我拍电影有很大的自由。我总是能拍我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有时候我早上醒来，“啊，我是这么写的？我到底怎么才能拍出来啊？”有时候这很难，但这就像战争与爱，你怎么能在战场上获胜？有些时候你知道，因为你之前做到过，有些时候你得去尝试去创造。当你面对一些不同的问题时，这让人很紧张，也很有趣。

我觉得乏味的东西是，当你发现你都知道了。通常人们安顿下来会觉得振奋，但我相反，我没有安顿下来，仍然在每天发现各种事情，永不停歇。我经历过的唯一一段枯燥生活，就是我的孩提时代，因为我住在一个如此平静的地方，没有冒险，没有波澜，什么都没有。我的家其实很可爱，一个小小的花园，一条小狗，很好的父母……好像缺了点什么。

问：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准备好了？比如拍摄《玫瑰之名》，听说你找了大量的神学家、历史学家坐在一起探讨，而这种研究是



永无止境的。

阿诺：当然，但是当你觉得够用了必须就得开始。或者这么说，作为一个导演，你每天都会被问上千个问题，有些很简单，比如镜头怎么摆。但还有些更微妙的问题需要你去做准备，你得研究行为、时代。如果有一千个问题，你能回答出七百个，那不错，剩下的三百个你要去问身边的专家。我通常都有一个顾问，比如关于蒙古的大量细节，蒙古包的门应该是怎样的，有的教派里它要迎着风，有的要冲北，这得看情况。我不可能知道所有事，那我就去问别人。我也不需要成为关于狼或者熊的资深专家，但是我要知道足够多，才能与真正的专家们交谈，并且在拍摄过程中执行这些研究成果。

我记得拍摄《玫瑰之名》的时候，由于都是中世纪的故事，尽管是从一本书改编而来，我写剧本的时候还是得在每一页都停一停。那段时间我几乎买了三百本书，而且还不够，因为每写一场，比如“他们拿着勺子喝汤”，我就要想，到底是拿着勺子还是拿着碗喝呢？接下来说“主教站在……”，站在哪儿呢？他平时又坐在哪儿？所有事情都是谜。每一分钟你都有一个新问题。我后来开始在板子上画故事主线，然后就会想到，他们会不会在墙上画一些壁画呢？有没有什么颜色是禁忌？所以你得找专家与你一起。

问：在现在电影工业越来越快速、成熟、焦躁的时候，这似乎是非常奢侈的做法。

阿诺：现在人们变得功利、浮躁，确实，

尤其在最近二十年。很多电影制作人觉得他们很了不起，因为这个时代做电影会出名，可以坐豪华车，跟很多俊男靓女出门。他们觉得要拥有这些，就必须成功，要成功就必须有钱。但我的看法是，如果你没有一个成功的生活，你完全不需要这一切。如果你拍空洞的电影，挖空你自己，要钱有什么用呢？你要戴名贵首饰，戴名表，开着闹哄哄的车，红色或者金色的，好显示你有多重要。这太肤浅了。但如果不以金钱为目的，而是你个人的完整性为目标，你依然会赚到钱，但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钱不再是首要目的，而成了一种奖励。

我觉得尤其在美国电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贪婪取代了爱。比如，如果一个画家只关心画卖得好不好，而另一个人只画他热爱的内容，后者也许不会像贩卖垃圾的那个人那么富有，但很可能他的画作会更持久，并且为他的生活带来另一个层次。很简单，你可以卖一辆保时捷，但是你买不来尊敬。到最后，这其实都是你与朋友、与他人的关系。留下来的不是这些表面的东西。不是说你有一个大游艇，你可以明天早晨吃鱼子酱就怎么样了，鱼子酱只能让你发胖，没别的任何用处。你不会与人们有真诚的关系，而这才是最重要的。

问：但这似乎是现代社会运作的方式。

阿诺：没错，我同意，但我也看得出我的同行里谁真正幸福。一些富人会愿意跟另一些不那么富的人交换生活，因为后者的电影



INTERVIEW

会被人记住，而不是只能让你能娶更多个老婆。一个就够啦。（大笑）我确实看到巨大的不同。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无论是在我的国家还是在美国，我最近遇到不少非常知名的导演，他们都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内心觉得很耻辱。如果这样你怎么能感到快乐？当然，在人前，在电影首映的时候，他们是大明星，他们咯咯直笑……我也看到另外一些人，工作诚恳，他们更坚实，也为这种生活感到更开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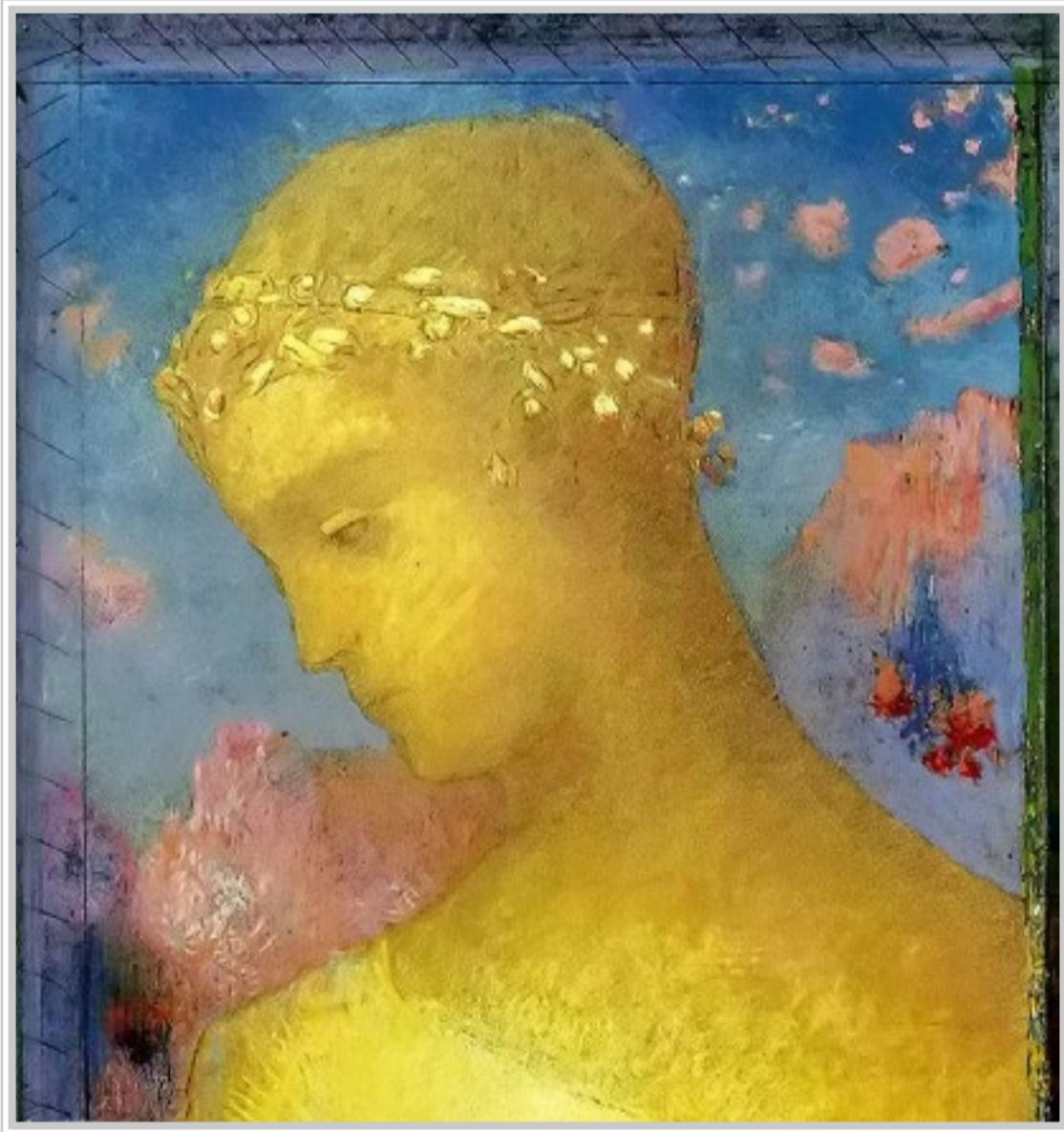
我觉得美国的生活方式很要命。美国原本是被一群想要来淘金的移民缔造的，他们还是要回去的，只是因为之前在自己国家生存不下去才移民。但遗憾的是，现在赚快钱的需求仍在，目的却没有了，人们不再想回意大利，回中国，把钱带给父母，在家乡一栋属于自己的大房子。现在这系统变得疯狂了，是为了钱而赚钱，然后呢？银行越来越有钱，那又怎样？它让我们更幸福了吗？没有。事情已经超出掌控了，电影领域也是这样。

当然，我尊重投资。我作为导演的责任

就是让我的制片人开心，我们是合作伙伴，我不想自私，我想分享。（笑）。如果别人给我我需要的东西来拍电影，那我的责任就是确保这不是一次不理智的投资。同时，我一直把电影事业看做一个大家庭。这是一个大产业。当你取得成功，对你和他人都有益，对整个产业也有益。这是游戏的一部分。成功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因为你的成功，会有更多投资进来，一个更年轻的导演就可以去经历更多，这是积极正面的。

我有时觉得在我的国家我没有被很好地理解，因为在法国，钱是坏东西，钱是罪恶的。但我需要钱去拍电影，实现我的梦想的钱，这之后我的责任是把投资赚回来。我曾经有一个很棒的项目，关于北极捕鲸的故事，但是它太贵，要花两百万美金。我只能找到一百万美金，最终决定放弃了。因为我不想变得疯狂找钱，也不想只用一百万将就。我想这是我的责任。我们在这儿不是为了让制片人们破产的。Q





– Beatrice –
Odilon Redon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鸣谢：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shrbooks@gmail.com
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问題，敬請來信告知。
獨立閱讀討論區：<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